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96期

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专辑（1）

目录

【概述】

李豫生 无“档”可查——人民大学文革历史概述

【述往】

张联瑜 我经历的人大“文革”当中的几件事

陆伟国 人民大学的“二月兵变”风波

王传纶 文革时就是应付怎么生存

【口述】

冯其庸 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张林南 我的成长史（口述节录）

【资料】

奋起千钧棒砸烂旧世界

（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1966.8.18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人民大学新校刊试刊第二期）1966.9.10

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评校筹委会

（人民大学新校刊试刊第七期）1966.10.10

我起来造反了

——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戴万春同志

在十月二十一日革命造反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人民大学新校刊试刊第十期）1966.10.31

【本刊声明】

【概述】

无“档”可查 ——人民大学文革历史概述

李豫生

站在人民大学校史馆十年文革展板之前欲哭无泪，在下方标示为1966~1976时间段的长近3米的展板上空空如也，只有一幅中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的图像，时间是1966年10月27日。那场大风暴似乎从未在脚下这片校园中发生过，所有那些逝去的灵魂、那些凶残和暴虐、那错乱与癫狂一切已了无印痕。

我们是文革中在校的老五届，是伟大领袖呼唤出来的“天兵天将”——“红卫兵”，文化大革命就是我们五年大学的核心“学业”，人大文革的历史，就是我们的大学生涯。如今，它已化作一片虚无，在人民大学，这段历史已无“档”可查。

无“档”可查的确切含义是今天的人民大学不存在本校1970年以前的档案，复校以后的人大校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无法查阅1970年学校一度停办之前的所有档案，所以也无从记述、研究、展示这段校史。结果即是校史展览中的这段空白。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是人大复校后设立的校史办公室负责人——陈伟杰告知笔者的。人大1970年10月停办，自有一番清产、移交的过程。复校后的学校所有档案已悉数上交到了上一级档案管理部门。1978年人大既已复校，档案为何未曾回归？其中尴尬的原因竟是一级别不够！原来，中国的大学是有行政级别的，而一所大学的行政级别是部级还是副部级，将直接导致各种的等级权限差异。文革之前的人大为正部级，原因或由人大校长是吴老——吴玉章所致，因为吴老的级别高，人大沾了光；而复校后的人大降了一级，仅为副部级，按照规定，副部级单位人员不具备到上一级档案机构查阅档案的权利，于是乎，做校史的人就看不见档案了。当然也不是绝对的不允许，那就是

非得要经过各种更严格的申报、审查、批准手续不可。复校后的人大领导为什么没能做，或者做不成这项努力，情况不得而知。档案反正是至今没看到。所以严格说来，并非无“档”可查，而是有“档”不能查。然而再往下细想，这个障碍其实是非常符合当前管事者的意愿和要求的，在文革历史于越来越成为“禁区”的大背景下，这自当是题中之意。只是，对于既设有中共党史、又设有历史档案等国家权威专业的人民大学来说，事情显得颇有些滑稽，难不成就真应了“冲着实事求是来，绕着实事求是走，背着实事求是学，离开实事求是干”那句广为流传的打油了吗？

所幸，真正发生过的历史绝不会雁过无痕，这场历时十年的民族大疯狂、大灾难怎么可能不留下铁证如山的白纸黑字？感谢那些背负着强烈使命感、责任心的民间仁人志士为我们搜集、整理、结集、出版了“红卫兵资料”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当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看到由宋永毅、丁抒等人编辑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中厚厚的几十本“红卫兵资料”，且人民大学当年曾先后出现的各个红卫兵主办的10余种小报几近悉数在册时，真是如获至宝，赞赏之情，由衷而生。真真“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夫”啊！经再次整编，集成中国人民大学文革小报三大册。内容为：

1. 人民大学新校刊 试刊 共十八期 1966.9.10~1967.1.12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主办

2. 红卫兵报 共十一期 1966.9.8~1966.11.26

中国人民大学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主办

3. 无产者 共四期 1966.9.16~1966.12.12

中国人民大学赤卫队工人大队主办

4. 红卫战报 共十三期 1966.10.1~1967.4.13

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 中国人民大学红卫队

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军 主办

5. 战地文艺 共八期 1966.10.18~1967.2.15

战地文艺社编

6. 红卫兵报 共一期 1966.12.18

中国人民大学八一八红色暴动委员会主办

7. 红色造反者 共五期 1967. 1. 16~1967. 2. 20
中国人民大学《红旗》战斗团主办
8. 追穷寇 共两期 1967. 1. 18~1967. 1. 30
南京邮电学院红色造反团 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驻宁联络站
全国革命造反串联总队 合编
9. 珠江风暴 共三期 1967. 1. 19~1967. 2. 3
中国人民大学南下革命造反团 主编
10. 新人大 共七十七期 1967. 3. 2~1968. 8
新人大公社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主办
11. 新人大报 共三期（红1~3号）1967. 12. 16~1968. 8. 4
新人大公社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红2、3号与人大三红合办）
12. 人大三红 共五十七期（14~71期）1967. 4. 20~1968. 8. 9
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 红卫队 东方红公社主办
（原中国人民大学人大三红主办《红卫战报》从第14期
改名为《人大三红》）
（《人大三红》第15期与《新北大》合刊 1967. 4. 20
第18期与《新北大》合刊 1967. 5. 4
第38期与光明战报合编 1967. 8. 16
第49期与光明战报合编 1967. 10. 9
13. 人大三红 共2期 1967. 12. 30 1968. 3. 9
首都红代会人大三红“八. 一一”战报编辑部
14. 冲锋号 共1期 1967. 2. 18
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驻宁联络站编
15. 红卫兵报 共3期 1966. 11. 22~1966. 12. 4
中国人民大学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主办（长征串联版——南昌）
16. 人大红卫兵 共1期 1967. 1. 29
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驻沪联络站主编
17. 人大三红（武汉版） 共6期 1967. 8. 15~1967. 9. 17
首都红代会中国人民大学人大三红中南联络站（武汉版）

岁月可以流逝，记忆可以淹没，但白纸黑字就在那里。它记下了时人之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不管你知不知道、见没见到，它，就在那里。这就是纸上文字的魅力，它使我们得以反思，本书几篇反思文字即赖小报留存资料而成。

红卫兵运动是文革史中最具特色的一个重要部分。文化大革命最大的“史无前例”，就是“红卫兵运动”，这一发明创造至今仍然有人在仿效。古来造反只有对立双方，以下反上谓之“造反”。文化革命亘古未有，是最高指挥召唤底层民众合力，将自身一手建立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架构砸个稀巴烂。这个所谓的“全国的全面的内战”，目的在于“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在“落花流水”之上建立起“五七”指示中的理想国。

一般说来文革时期是指1966~1976十年，人民大学因其停办只能算是1966~1970文革五年。但从“红卫兵运动”的角度来说，这段“史无前例”仅只撑了两年，从1966年兴起搅得天下大乱，到1968年武斗不止不可收拾，红卫兵终于被武力清场、彻底抛弃，昔日的嫡系、御林军变为日后的三种人、阶下囚、清算对象。自1968年7月27日夜三万工人、解放军攻入清华，曾经“通天”的红卫兵退出了历史舞台，并被清算至今。随后，工军宣队进入各大院校，因循了历次运动自上而下指派工作队伍的旧例，虽然避去了“工作组”的旧讳，冠之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新名，但终归是重新返回到了上令下行的模式，算不得什么“史无前例”了。

囿于前文所述之“无”档可查的因由，本文只能依据人大的红卫兵小报对人大的红卫兵运动史做一概述，而在红卫兵消亡之后人大从停办到复校的历史，依然是“无”档可查。

整个红卫兵运动从1966年7月26日到1968年7月27日，恰好两年。为什么要从1966年7月26日算起？这是因为那一天夜晚在北大大操场召开的两万人大会上，伟大领袖的夫人、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声嘶力竭地高喊：“要撤销工作组”“要罢张承先的官”；康生亦跟着阴阳怪气地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就此宣告了工作组的终结。自《五一六通知》吹响了大革命号角之时至工作组垮台之日，过程中的一切都还只是序幕、前奏，扳倒校领导、扳倒校党委，踢开新市委、踢开工作组，清除一切障碍，空出舞台，大幕拉开，登台亮相的主角正是“红卫兵”。

7月26日晚之后的第六天，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横空出世，痛斥“五十多天里（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作者注），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的罪行，8日，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简称《十六条》）盛赞：“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既然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症结，不需要任何“反动路线”管辖约束的革命群众，又应该以怎样的态势鼓动起这场“地覆天翻”呢？六、七月份在北京一些中学秘密出现的红卫兵组织，进入了伟大领袖的视野，他从中欣喜地发现了甚合朕意的行动力量。8月1日毛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对他们写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此后，中学老红卫兵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杀向社会；大学红卫兵组织随之纷纷成立，站到了学校运动的领导位置。紧接着，毛泽东又在天安门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总人次达1100万之众。在伟大领袖的挥手之间，北京红卫兵奔向全国各地，俨然以革命火种、钦差大臣自居，以“红卫兵运动”为标志和特色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这样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人民大学的红卫兵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保郭”与“反郭”之大辩论及“保皇派”的终结（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七年二月）；第二阶段“人大三红”与“新人大公社”争当革命左派（一九六七年三月至一九六七年八月）；第三阶段“人大三红”与“新人大公社”武装割据血腥武斗（一九六七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

第一阶段“保郭”与“反郭”之大辩论及“保皇派”的终结

（一九六六年八月至一九六七年二月）

人民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自一开始就围绕着“保郭”和“反郭”的激烈对立展开。与清华蒋南翔、北大陆平不同，郭影秋校长是文革前三年1963年才调人大工作的，他非但没有背负前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怨，相反正

是为解决这些问题，吴老吴玉章校长才亲自出面把他要到人大来。一位当时在郭校长身边工作的人大校友宋士忠这样回忆：“上世纪60年代初的人大，由于1959年‘反右倾’和1960年‘反修教学检查’等政治运动的影响，在领导干部和教职员中积累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因为矛盾长期未能解决，不少人思想不愉快，使得学校纪律松弛，人心比较涣散。郭校长到校以后，从调查研究入手，逐渐理清了头绪，澄清是非，明确责任，消除隔阂，化解矛盾，使人大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短短两年，郭校长在人大师生员工中就获得了极高的威望，他的作风、品德、能力、学识都深受广大师生员工的爱戴和尊重，也深得吴老的信任、喜爱、倚重。1965年郭校长带队到京郊苏家坨四清，时间不到一年，同样给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敬佩和欢迎，被农民誉为“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如是，运动伊始，针对郭影秋的大字报一出现，就在群众中引发了强烈反响，学校立马形成了绝大多数“保郭派”和极少数“反郭派”的尖锐对立。吴老对反郭极为反感，多次说过：“谁反对郭影秋，谁就是反革命！”

反郭的人群中，有的是消息灵通人士，有渠道知道郭影秋这次站错了队，犯了路线错误；有些是“政治嗅觉灵敏”，对“路线斗争”深悟其道、能紧紧跟上前进步伐；当然还有一些是在人大过去运动中跟原领导胡锡奎比较紧，而郭来后纠错批胡，胡调离人大后感觉压抑……这些人汇聚成一股反郭的力量。

人民大学关于郭影秋问题的两次大辩论是文革初期的一个典型事件，几十年后回望历史，才恍然醒悟到这一事件在当时历史进程中所处的节点位置。

关于郭影秋问题的两次大辩论的直接导火索是康生7月27日在北师大群众大会上所散布的“二月兵变”的谣言。继7月26日晚在北大赶走工作组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等人隔日又急忙跑到北师大继续煽动群众挖黑线、赶工作组。为了敲实黑帮、黑线的组织存在，康生信口雌黄，扯出了一个煞有介事的“二月兵变”谎言，康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这个大黑帮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

郭影秋校长的回忆录清楚记录了他与康生这个造谣者的当面较量：

“早在1966年5月中下旬，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北师大相继就‘二月兵变’贴出过大字报，甚至指名道姓地质问：‘郭影秋是什么人？’我知悉有这样的的大字报后，一笑置之，根本不当成什么事。不料，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上，康生突然向我发问：‘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大字报我虽未看过，但我知道这件事。’康生又进一步说：‘你知道，为什么不汇报？’我又说，‘我认为大字报揭发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有的事，所以没有汇报。’当时，康生冷笑着‘嗯’了一声，随手从包里拿出个材料给我看，原来是他的联络员给他写的一个汇报。材料中说：北大某某大字报揭发北大、人大都曾有过驻军，是要搞兵变。康生用红铅笔在材料上划了大杠杠，还指着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嘛！’为此，我不得不把事情的经过与原委向他说明。

这件事本来是很清楚的，1966年初我正在海淀苏家坨搞‘四清’时，北京卫戍区曾派人到人民大学借过房子。据来人说是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新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该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为此，卫戍区先后到各处找房，均无结果。后来海淀区武装部向他们介绍说，海淀区有几个大学的学生都下乡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是否可去联系暂时借用。当他们到人民大学联系时，在学校的同志表示可以安排些房子暂时借用。学校的同志也向我汇报过此事。但是，后来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同志认为部队住在学校不一定合适，决定不在学校借房，而住到郊区的一个靶场。从这件事的前后经过看，怎么能得出是彭真想搞兵变的结论呢？不料，康生却未由此而善罢甘休，他于7月27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讲了那番耸人听闻的话。这不明明是凭空捏造，有意栽赃陷害，且趁机打我一耙吗？！”

康生之流为什么“凭空捏造，有意栽赃陷害”且乘机打郭校长一耙？一方面，正如郭校长所披露的是对他们多次拉郭校长入伙他们的“反刘司令部”、而郭校长拒不理睬的一种报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当时正是伟大领袖最依重信赖的一群，是伟大领袖痴迷钟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炮制者、鼓吹者、催动者，离开他们的捕风捉影、臆想妄断、污蔑构陷，就不足以生生捏造出一个个反党集团、一群群黑帮、一条条黑线，乃至偌大一个与伟大领袖对抗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来。而只有这种“敌对势力”的确实存

在，才能证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完全正确、非常及时”，证明伟大领袖之天纵英才。

刘炼老师的回忆录《风雨伴君行》中也把当时情况记述的很清楚：疯狂起来的学生们7月29日凌晨三点钟，看到法律系的学生转抄了康生在师大的煽动性讲话，说彭真“搞‘二月兵变’的阴谋时，郭影秋知道此事而没有报告”。一句话引起学生更大的疯狂，立刻去市委把郭影秋揪回来，搜了他的文件，打了他的司机，并在新饭厅召开斗争大会。他们给郭影秋戴上纸高帽，并把他夫人凌静也揪上来陪斗。（见刘炼《风雨伴君行》P194~195）

以法律系为主的反郭派学生把郭影秋校长揪回学校批斗以后，激起了保郭派学生的极大愤慨，当时的计统系四年级陆伟国同学详细记录了那两天的情况：

第二天晚上（29日凌晨 作者注），郭影秋就被造反派揪回学校在新饭厅批斗。震天的大喇叭，把我们都吵了过去。会后，郭还是被押到我所住的宿舍东风三楼底层，法律系的男生宿舍（就在新饭厅旁边一点）。结果，大批不赞成批郭的学生、员工尾随过来围在楼前，我也在其中。直到黎明将至，人数越来越多，人声鼎沸，争吵不息，情况渐渐趋向激化，最后，造反派只得把他放出，这边的人把他转移到了农经系的学生宿舍。

7月29日，郭影秋被撤销了刚担任两个月的北京市委书记职务和作为华北局代表列席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资格。当晚，我们正在文化广场上观看大字报，消息传来，大家为此实在气不过，一时群情激愤。不知谁喊了声：“我们到市委去要个说法”。马上一呼百应，迅速聚拢起几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台基厂的市委大楼径直而去。进去之后，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原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大学工委的陶鲁笏（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张经武（原西藏工委第一书记）等先后出面接见我们，作了一番说明，但都是推托之词、不得要领。

彻夜不眠之后，我们一行上百人，又从市委去了北海西侧的中央文革住地找康生……等回到学校，已是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这一生还没有过。进了宿舍倒头就睡。（见陆伟国《人民大学的二月兵变风波》）

从27日晚康生关于“二月兵变”的造谣，到29日凌晨郭影秋被揪回人大批斗，再到29日晚郭影秋被撤职，再到当晚数百师生先去市委而后第二天又去中南海康生处讨说法……人大师生持续几天几夜的群情激愤，是到了新市委、

中央文革不能不给个答复的时候了，这就是“八二”大辩论直接起因。

郭影秋被宣布撤职的大会是29日傍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大会，全称为“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会上李雪峰宣布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同时宣布了撤销郭影秋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先后讲话，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这次大会人民大学积极分子的选派，是由新市委派遣的联络员张经武、陶鲁笳直接到人民大学“深入群众”摸查找到的，他们来前已经弄不清当时人大是否还有任何可以联络的基层组织。

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行将倒台的中央“一线司令部”对紧跟伟大领袖积极运动起来的群众的一个无奈而必需的交代。

本来，任命以李雪峰为书记的北京新市委和向各大学派出工作组开展文化大革命，是执行5月4日至26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这次会议遵循伟大领袖三月底在上海与康生、江青、张春桥讲话定下的调子，即“彭真旧市委是‘独立王国’、陆定一中宣部是‘阎王殿’”，批判了新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通过了毛泽东亲自制定的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会后按毛主席指示派工作组的第一例，就是5月31日陈伯达带工作组到人民日报夺权。所以以后陆续派工作组的举措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伟大领袖不知情、和伟大领袖对着干的问题。但是，自领袖7月18日从武汉返回北京之后，事情起了急骤的变化。25日领袖对工作组问题明确表态：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于是就有了26日江青、康生在北大的直接发威。

工作组已派出50多天，“二线太上皇”突然强调说工作组错了，那就只能撤掉，撤掉之后怎么办？“一线司令部”除检讨承担责任以外，已经完全无法预知，“你们不知道”“我也不晓得”“老革命碰上新问题”，只能大实话告知。职责所在，“不晓得”也要继续，最高领袖还有指示，就是要求一线中央的领导通通下去，听取群众的意见，于是就有了邓小平和陶铸到人民大学参加

郭影秋问题的两次大辩论。在八月二日的第一大辩论会上，邓小平说：“我们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来向你们取经的”，陶铸说：“我同小平同志来，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叫我们去各个大学向同学们学习，向同学们问好。”此言倒是

不虚。刘炼老师回忆中记述的她当时注意到的情况也证实了以上说法。刘炼老师的回忆说：“后来从陶鲁笏的交代中得知，早在7月13日中午，邓小平、陶铸到北京新市委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中央领导人要下来联系一所大学，指导‘文化大革命’，他们商量后决定到人民大学来。陶铸给郭影秋定的调子是犯错误，所以7月29日群众大会上陶鲁笏按陶铸的意见讲了话，说郭影秋与“二月兵变”无关，但学生们进而批判陶鲁笏。这时邓小平、陶铸才亲自出马到人大参加郭影秋的辩论会，这实际上是直接抵制康生的挑动。”

人民大学就郭影秋问题展开两次大辩论的时间，正值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期间。当保郭派的群众执着于弄清郭影秋到底是几类干部？所谓“二月兵变”是不是空穴来风时？他们绝对不可能知道，也绝对不可能想到郭校长之所以首当其冲被撤销了新市委文教书记的职务、被同意揪回学校批斗，并非因为他不是一、二类干部，也不是因为有否二月兵变，而是因为他作为新市委的文教书记，在“派工作组”这个问题上，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领袖断言“百分之九十的工作组都是干尽了坏事的”严峻气氛中，尽管从十一中全会会议的一开始，刘少奇就承担了责任、做出了检讨，随后两天中央各部委、各大区的负责人也纷纷跟着检讨，说“跟不上形势”“跟不上主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领袖仍不满意。在8月4日的会议上他发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他认为派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并且公然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见席宣 金春明着《“文化大革命”简史》99页）在当日召开的小会上，毛泽东大发脾气，严斥刘少奇害怕群众，刘少奇忍不住声高：“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泽东批“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搞专政”，刘少奇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继而愤言：“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这是刘少奇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毛泽东正面冲突。刘的抗辩彻底激怒了毛，终于使其雷霆震怒“炮打司令部”，

这就是8月5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横空出世的炮引。（引自《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孙兴盛采访王光美》）

“派工作组”的问题在短短几天内被上升到两大司令部对垒的高度，一方面是由于伟大领袖已决意要以“天下大乱”的方式解决“党变修、国变色”的执念，另一方面也绝对缺少不了江青、康生、陈伯达一干心腹对领袖的应和。置身于这场如此尖锐险恶的政治斗争当中，负责派遣工作组的执行要员郭影秋又如何能脱得了干系？在担任新市委文教书记并列席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江、康、陈一伙对郭影秋极尽又拉又打的阴谋伎俩。作为临危受命的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北京各大院校的工作组从人员组织选派到实施跟进都由郭影秋担负，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参与其中，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却大耍两面派手法，出尔反尔，把事情描摹成上至刘、邓下至新市委蓄意对抗伟大领袖的模样。在雷霆万钧的压力之下，7月28日北京市委只能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7月29日在“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郭影秋成为首个被撤除职务的新市委书记处书记。身为当事人，郭影秋在回忆录“往事漫忆”中，对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

八月二日晚关于郭影秋问题的大辩论在学校南大操场举行，邓小平、陶铸、吴德、陶鲁笏、张经武等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人出席，本校师生员工加之外校、外地旁听者，数计有万余人众。晚8时许，辩论开始，新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主持。“保”“反”双方旗鼓相当、针锋相对，一方断言郭影秋是坏人、是黑帮头子，另一方坚称郭影秋是犯了错误的左派，争论激烈、言辞犀利。辩论进行到深夜12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且越争越激烈，越辩越对立。

邓小平和陶铸在辩论暂告截止后发表了讲话。

邓小平重申了文化大革命是“老革命碰上了新问题”的观点，并说明工作组是新市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派的，派工作组的责任，由中央在北京的同志来负。对于“二月兵变”，邓明确表示没有那回事，说：“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子）我也调不动。”

陶铸针对郭影秋是不是“黑帮”的问题，给了一个服从群众辩论结果的答复，所谓群众说是就是，群众说不是就不是。

从以后了解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真实情况来看，无论邓陶当时都是在尽量理解和紧跟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尽量动员和说服群众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他们不会想到下一步的革命就是直接革到他们两个头上。

在第一次大辩论的8月2日到第二次大辩论的8月20日当中，人大的两派红卫兵产生。八月八日，“反郭”派“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成立，八月十八日“保郭”派“中国人民大学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在校党委被冲垮以后，吴老秘书王宗伯联络各系各单位代表组成了“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成为当时学校的临时行政机构。

8月20日第二次辩论大会的场面更加激烈，已成立的“保”“反”两派红卫兵代表分坐主席台两侧，轮流发言。由于苏家坨600农民的到来参与，大大地增加了现场的紧张气氛。保郭派占了压倒优势，反郭派表示不服高压，双方对立情绪不断升温。邓小平因已被“靠边”，未来参加。新上升为中央四号的陶铸因清楚了解领袖支持造反派、反对工农干预的态度，对农民到校保郭提出了批评，从而引起了保郭派的大大不满，有人向台上的陶铸投掷石块……处于弱势的反郭派感觉受到了陶铸的保护从此倾向于保陶，而保郭派认为自己充分有理竟遭陶铸批评，就此决意反陶。一场混战，终无结果。不幸的倒是其中派生出来的“600农民进城保郭颖秋”问题，被伟大领袖抓了重点，作为调动工农镇压学生的典型，成了压垮郭颖秋的最后稻草。

进入十月，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十三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一出，一切都明朗化了。10月9日—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秀才们制作好了帽子，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郭颖秋七月三日所做的《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汇报要点》曝光，坐实了他在路线斗争中的“黑线”位置，保郭派土崩瓦解。十月十三日和十五日部分“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部分人起来造反，参加了“反郭派”召开的批郭大会。十月十六日“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一连成立；十

月二十一日八一八造反大队成立；十一月三日八一八红色造反二连成立……十二月十五日晚八时，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暴动委员会举行暴动，暴动委员会冲进八一八团部、《红卫兵报》编辑部实行接管。

一部分暴动者投向了三红（人大红卫兵、红卫队、红卫军的总称）；一部分造反者成立新的红卫兵组织，如《人大红旗战斗团》《北京公社》等。但还有原来“八一八”的最顽固核心成员又最后挣扎了一把，1967年2月23日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发表后，他们还是固执地认为，郭影秋是犯了错误的好干部，还想解放他。为此，他们做了一系列的串联和策划工作，这一切被反戈一击的新造反派视为大忌，唯恐避之不及，急忙和他们撇清关系。至此，保郭派烟消云散。在三红的争取下，这次事件的主要策划人李德山（哲学系学生、原人大武术队队长、“铁杆”保郭派）倒向了三红，并在后来的两派武斗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三红减小了不少牺牲。这正是历史的令人唏嘘之处！

1967年元月伊始，与人大初期文革纠结不清的陶铸突然被拉下马，他罪名只有一个，就是从来没有把中央文革看在眼里！

1月4日陈伯达、江青在接见“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兵团”的讲话中宣布了陶铸的罪状。陈伯达说：“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他是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未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江青插话：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陶铸被诬陷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突然被打倒，受尽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几经整合，人民大学一个新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成立了，它就是《新人大公社》。

第二阶段 “人大三红”与“新人大公社”争当革命左派

（一九六七年三月至一九六七年八月）

在扫清了“保郭”和“保陶”的障碍之后，人民大学的两派革命群众终于和无产阶级司令部接上了关系，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冲锋陷阵，杀上了大革命的前沿。一九六七年元月三十日中央文革大员戚本禹到人大讲话，指明了

人大文革的方向、任务：

……人民大学是我们新建立的，是我们中国解放以后，自己人民建立的大学，但是由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化思想战线他们相当长的时间占统治地位，成了推行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的一个阵地……

……差不多文化大革命里面所碰到的全党全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重大事情，你们这里都涉及了，什么陶铸、什么邓小平、什么刘志坚，什么王任重都跟你们这里有关系，（鼓掌）而且是你们这里他们很多所谓大人物，都到你们这里来过。什么陶铸、什么邓小平，所以你们这里的斗争任务是很艰巨的、光荣的。（鼓掌）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非常关心人民大学的。（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从外地回来以后，要了几个大学的材料看，其中就有人民大学的。还专门向我们要了你们学校的全套材料看，其中有清华大学的，北京大学的，师范大学的、人民大学的。所以我们的统帅、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舵手、我们伟大的导师是非常关心我们的。

一九六七年元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夺了原上海市委的权，史称“一月风暴”。对此，毛泽东十分兴奋非常赞赏，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一月风暴”掀起的夺权狂潮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所有一线工作的老干部，一时间各大区、各大局、各省部委、各军兵种乃至各军事院校……所有的一把手统统成为被揪斗、被打击、被残害的对象。除中央文革一小部分人以外，几乎全党所有干部都被推到了伟大领袖的对立面上。

老干部不干了！于是就有了军队干部的“大闹京西宾馆”和“三老四帅”的“大闹怀仁堂”。

2月16日 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大乱天下”的强烈不满爆发了。叶剑英质问中央文革一干人等：“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18日晚严厉训斥了这批鞍马故旧。自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央7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这批老人进行批斗。从此，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天下终于彻底大乱。

继上年12月15日暴动委员会接管八一八团部、《红卫兵报》编辑部以后，经过整合，12月27日红色暴动委员会宣布解散，红色造反派自1967年1月1日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大学《红旗》战斗团”（简称人大《红旗》）。至3月2日《新人大公社》成立之前，人大《红旗》成为与“老造反派”“人大三红”（一度改称‘东方红公社’）相对立的“新造反派”组织核心。

“老造反派”不接受这个反戈一击、冒出来和自己平起平坐的“新生造反派”，多次暴力袭击，想把对方荡平。其间有：1月13日抢劫报卡社生产用纸6卡车；1月14日抄砸《井冈山公社》《秋收暴动》战斗团办公室；1月15日抢砸交通股，封闭车辆、砸毁牌照、放瘪轮胎；1月20日，两次洗劫人大《红旗》、北京公社、《遵义》兵团、《南征北战》兵团等组织办公室，损毁布置，抄走全部纸张、文具、资料

1月15日，人大三红还仿效上海造反派单方面宣布夺权，结果只不过是到十五个校务部门兜了一圈，宣布了一圈，没有得到任何认可。

1月21日一些“老造反派”急于建功，和中央高级党校的一派纠集在一起，炮打康生，在人大校园贴出康生的大字报，三红总部先是予以支持，隔日，又急忙发表声明，承认错误。

24日，“人大三红”参与反对康生的几个人，前往“中央文革”，向康生当面请罪。

25日有关人员寇金和、鲁从明等四人又被带到中央党校，向党校“红旗战斗队”认错。离开时，刚走到党校门口，就被等候在那里的近百名人大《红旗》等组织成员截住，拖回学校，在大教室批斗，四个人遭到残酷殴打。“三红”召集人员前去抢人，双方混战。事后“三红”称，自己一方有7人被打，4人重伤住院，其中2人昏迷。

2月22日在《红旗》战斗团、北京公社、遵义红卫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

兵等组织联合的基础上，《新人大公社》宣告成立，负责人是赵桂林、张祖义。三红攻击《新人大公社》是保守组织“八一八”“赤卫队”的重新纠合，但是中央文革不这样看，原来，新成立的《新人大公社》领导成员之前就与中央文革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以及他们在哲学社会科学学界的派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新人大公社》成立的次日2月23日人大哲学系主任肖前贴出第一张“亮相”大字报，不久肖前即加入新人大公社，并成为新人大公社的副社长，核心组成员。肖前和关锋是师友关系，一直受关锋的提点；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关锋、林聿时、吴传启三人就以“撒仁兴”（即“三人行”）为笔名写了不少文章，名噪一时；肖前和吴传启是西南联大的同学；林杰在《红旗》杂志师从关锋，两人合名写过多篇重头文章；六六年八月底，赵桂林在武汉与林杰结识，赵从此说：“我们今后有任何材料都可以通过林杰同志往上送。”；王力、关锋、戚本禹是领袖的马前卒、爱将，他们的文章对文革发起、催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月3日凌晨，戚本禹来人大召开大会，直接给人大的文化大革命布置任务。戚本禹说：“我看你们人民大学的第一位敌人是孙泱（众，打倒孙泱！），孙泱要打倒，但是没打倒，你们团结不起来，打不倒孙泱、第二是郭影秋（众，打倒郭影秋），第三是胡锡奎（众：打倒胡锡奎），”戚本禹又对人大前一阶段的运动做了评判，他说：要允许过去的保守派革命，造反不分先后，说他们是“保皇派”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大联合。戚不赞成三红前一阶段的打砸抢行为，且特别对三红炮打康生严厉批评。他给了三红一个“三七开”的评价，要求两派团结、联合。

在延续到次日晨的小会上，戚本禹宣布解放肖前。

戚“三三讲话”后，人大两派群众组织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革命任务主要有两项：一、审孙泱；二、大批判。

戚本禹宣布孙泱是人大的一号敌人，使一些人大师生感觉愕然，直至文革之后人们才得知这背后的罪恶主使原是领袖夫人江青。

在公审戚本禹的法庭上，公诉人指出：“现在，已经彻底查清，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出现的诬陷朱德委员长的活动，主要是戚本禹秉承江青的

旨意煽动起来的。”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戚本禹这样说：“在中南海里面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她和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反对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在延安时，党内的那些老大姐，包括康克清，都不喜欢江青，都孤立江青，说江青是妖精。”

1967年1月21日晚，在全国政协小礼堂戚本禹就对人大红卫兵明确提示：“不要以为打倒刘邓陶就完了，还有呢。”“你们人大不是有个走资派叫孙泱吗？他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可以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他还说：“孙泱是蓝衣社特务”。

搞孙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搞朱老总。朱德与孙泱的父亲——中共早期革命烈士孙炳文是生死挚友、莫逆之交，而周恩来是朱德和孙炳文的入党介绍人。以后数年，孙泱被朱德视为义子，担任朱德的秘书，孙泱的妹妹孙维世被周恩来收为养女。

为从孙泱这里找到打倒朱老总的突破口，中央文革成立了专门的“孙泱专案组”，人大两派也设立了同样的专案组。

人大三红1967年10月14日第61期“‘从孙泱罢官’到‘孙泱之死’”一文对三红斗孙泱的业绩记述详细：

“三月四日以后，三红加强了孙泱专案组的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孙泱是日特、苏特的质疑，并列为专题，分赴全国数十个地方，调查了三百多人次。”

“五月上旬，三红向戚本禹同志做了关于孙泱问题的专题报告：（一）杨尚昆之弟杨x x系x x x特务；（二）孙泱与杨x x的密切联系；（三）直至六三年孙泱与蓝衣社成员密切联系的情况。

这一时期，三红战士贴出了大量揭发、批判孙泱的大字报，还编出五本孙泱“罪行录”，约计二十五万字左右。”

“七月五日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来校，传达伯达、富治、戚本禹等同志在三红孙泱专案组报告上的批示。

七月十四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派人跟我们一起研究孙泱案情，并在他们的领导下展开工作。

七月二十四日到八月十九日三红总部作战组组织了七次中、小型会议，对孙泱进行轮斗。

九月十七日新人大公社偷偷劫走孙泱……十月六日孙泱在新人大公社总部突然死去。”

事涉机密，这些专案组是怎么配合工作的，未见小报报端。但显然正是这些反复审查导致了10月6日孙泱在新人大的拘押处莫名死亡。当孙泱在9月17日被新人大抢到总部图书馆大楼关押之后，中央专案组有否来过？死亡当晚何人值班、看守？这些情况照常理怎么可能无人知晓？但竟都成了永恒的谜团，原因一定是所有知情人都默守同盟，终生缄口了。孙泱因朱德而死，后来，孙泱的妹妹孙维世也因江青的妒恨被迫害惨死。

人民大学被中央文革看重，主要是因为人大是“笔杆子”。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威力就在于“拿起笔，做刀枪”，“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革命需要炮弹，人大可以充当制造炮弹的兵工厂，在人大成立的以“新人大公社”为组织联络者的“批资联委会”，就充当了这个角色。

据《新人大》第五期（1966.3.29）载：“三月二十四日上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筹备会议在我校图书馆大楼召开。哲学社、社会科学部红卫兵联队、北师大井冈山公社、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教育部延安公社、人民教育出版社红旗联队、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等六个发起单位的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成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联络委员会》的有关事宜。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全力以赴地承担起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使毛泽东思想永远占领意识形态阵地而作出自己的努力。”其中的关键句当然是“全力以赴地承担起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下达任务的当然是中央文革。

“批资联委会”后来总共组织写作了多少“重磅炸弹”批判文章，缺乏统计，但从1967.9.7新人大第37期第三版一篇报道“新人大战士奋战红八月”中可窥一斑，报道称：“为了把革命的大批判推向社会，使这场彻底埋葬刘邓王朝的伟大革命运动，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我新人大公社先后组织了六次大字报上街，一张张革命的大字报象匕首，如投枪刺向了刘，邓、陶，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我公社‘红色尖刀连’的同志们在北京城里日夜奋

战，他们搭起了大量的宣传专栏，贴出大批判的革命大字报。”“我公社广大战士响应党中央号召……纷纷挥笔上阵写出了大量批判文章”“仅在八月上中两旬就被《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选登了三十多篇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播送了我们已发表的文章的三分之一强。”

同为大批判，两派仍有一争，一定要分出个胜负来。在人大三红 1967 年 9 月 7 日第 42 期 第一版社论 “大批判中两种根本对立的方针”中，攻击新人大 的方针是“突出资产阶级政治……让一些不三不四的所谓‘硬笔杆’，甚至是牛鬼蛇神，关起门来写文章送报社，搞经院式批判，脱离现实斗争，脱离工农群众，脱离思想革命。”而肯定自己的正确方针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搞群众运动，打人民战争，面向社会、面向工农，有组织、有计划地，全心全意地进工厂、下农村，和工农一起批判刘、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为此，三红搞得大批判是“千军万马 龙腾虎跃”：

“从去年十二月开始，三红战士就把揭发批判刘邓的大字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贴满北京城街头、火车站、饭馆、医院乃至小胡同，送到工厂农村，……又在市区许多重要区域开辟了大批判专栏，定期出版，每周至少一次，……据不完全统计，已在市区开辟大批判专栏近四十个。”

“《红卫评论组》一共九个人，办了四个大批判专栏，每出一次计二万余字，已经出版了六十五期……”

“元月份以来人大三红先后派人分赴石景山钢铁厂、门头沟煤矿、北京内燃机厂、北京光华木材厂和起重机厂等几十个工矿企业和京郊房山、顺义、平谷、通县、海淀等十多个县、区、农村人民公社进行宣传，他们协助当地支左支农的解放军同志，和工农群众在一起，在工厂农村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三红战士克敌制胜、克难制胜的巨大动力。他们牢记毛主席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碍人的前进的教导，在大字报上街、开辟革命大批判专栏、下乡下厂宣传等斗争中，排除干扰，克服了物质条件等方面的困难。没有卡车，他们就骑自行车；没有平板三轮，就凭两条腿；缺浆糊，他们就代用黄泥；纸不够，他们就想办法一纸多用。有时下乡去为贫下中农作宣传，每天要在崎岖的小道上跑上上百里路；有的女同志跑一天，全身酸痛，甚

至被摔的遍体鳞伤，晚上连上床都困难……”（见人大三红 1967年9月7日第42期 第2~3版《千军万马追穷寇》）

数月当中，两派组织、参加了校内外多次批刘、批邓、批陶、批朱、斗彭德怀、斗谭震林、斗余秋里……等大型批判活动。

自戚本禹3月3日在人大发表讲话，特别强调要团结、联合以来，人大两派毫无联合的迹象，而且相互攻击，斗争愈来愈烈，根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亮相在两派的干部不同，把学校十多年的运动旧账又带到两派中来，既然有了中央文革同时都承认的两个明确山头，谁肯甘拜下风？在校内，三红攻击新人大总部“是人大黑党委的招牌换记”，说黑党委中的十多名特务、叛徒、走资派、反革命分子——孙郭胡、李培芝、凌静、赵德芳、肖前、黄达、方志西、徐景秋、罗髻渔、薛政修等，是新人大黑后台。新人大则攻击三红是由“以聂（真）、崔（耀先）、朱（真）、铁（华）为核心的人大地下黑党委”操纵的反动“臭老保”组织。在校外三红、新人大分属于北京大学生红卫兵的两大派别，一个“天派”、一个“地派”。

按照伟大领袖的构想，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障碍，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以后，革命群众就会自然而然地联合起来，与革命干部、支左军队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天下即此就能从“大乱”达到“大治”。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争当“革命派”的斗争岂止是残酷而且是血腥，在军队、民兵的武装介入之下，大乱之中连续发生了重庆大武斗、广西大武斗、广州大武斗……

是年7月20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客观上为伟大领袖挡了枪、从武汉载誉归来的王力，顿成当世英雄。此后形势便如脱缰野马，发生了过山车般的眼花缭乱。

为文革发起立下汗马功劳的少壮派王、关、戚开始“造反过头”了。

一方面他们在宣传口推出了更加惊骇、更加醒目的“打倒军内一小撮”大标题，瞬间席卷报界、覆盖神州。

另一方面，他们在外事口鼓动造反派夺大印、斗陈毅，直至“火烧英国代办处”，酿成举世侧目的外交事件。

伟大领袖警觉了。面对《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揪军内一小撮”毛义愤填膺地喊出“还我长城”！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恶性事件发生后，他同意周恩来的紧急要求：拿下王、关、戚！8月30日，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次年一月，戚本禹遭同样处理。江青、康生、陈伯达见势急忙调转口风，推卸责任，把自己洗脱干净。

对于王关戚的倒台，知情人闫长贵的评价不失为公允，他说：“他们的倒台和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以及许多被打倒的党政领导人不同：刘、邓、陶等人都是因所谓‘不贯彻执行革命路线’被打倒，而‘王关戚’他们则是因积极（或过分积极）推行革命路线、极左路线被抛弃。”总之是造反造昏头了。

此前，作为王、关、戚的“嫡系”，无论是发表“打倒军内一小撮”社论，还是到“火烧英国代办处”现场助阵，人大两派都有积极参与。此时头领翻车，紧急刹停，何去何从的问题严峻地摆在了人大两派特别是新人大公社面前。更严重的内斗——血腥武斗拉开了大幕。

第三阶段 “人大三红”与“新人大公社”武装割据血腥武斗

（一九六七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

王力、关锋8月30日在中南海被隔离审查，疑似人大三红在第一时间就得到消息，急速行动，9月1日晚把毫无防备的肖前从家中抓走并迅速转移到体育学院。不明就里的新人大得知消息，以为肖前是被关在东风三楼法律系学生宿舍，立即出动了近500人把东风三楼团团围住，双方发生冲突，这就是此后互抓互占、两派逐步分踞校园一侧武装对峙的开端。

去抓肖前的正是遭新人大嫌弃，无奈投奔三红的哲学系四年级学生，人大武术队队长李德山。

是夜，东风三楼外人越聚越多，三红与同为天派的北京体育学院联系，从东风三楼临街后窗把肖前包上棉被扔到接应的卡车上，转移到体育学院的一个游泳池看押起来。夜半，肖前翻窗逃脱，大约是听到了大广播中王、关倒台的消息，知道大势已去，无路可逃，自己灰溜溜地回到人大。

这边，赵桂林不甘死心，九月二日一早就到社科院民族所打探消息。后来

在场的王恩宇交代说：“赵坐（下）后讲：他们（指人大三红——编者）把肖前抓走了，打了一顿，打完后捆在门板上，打得半死，扔在外面，我们到地下水道找，也没找到。他们对我们攻得很紧，可能要砸我们，搞武斗，我们也得准备，我们把水池的铁棍子都拿来了，武装自己。洪涛说：是啊，也要像民院这样，搞武斗。赵说：我们也得把人员集中一下，占几个楼，准备一下，把我们的人组织一下。”

九月四日晚，人大两派都被通知参加了中央文革召开的一个小型会议，会上江青宣布了王、关的问题，说三红反肖前反对了，批评了赵桂林。会后赵桂林告诉向他打探消息的洪涛说：“江青同志说穆欣是特务，吴传启是陶铸的人，肖前是特务，林杰是《红旗》一个小编辑，他的问题中央会解决。你们不要插手。”

大树即倒，新人大向何处去？

新人大中立即有人“弃暗投明”“再次造反”。九月十二日“新人大斗肖联络站”成立，其后发布的“肖前与反党阴谋集团的若干罪行”细数肖前操纵新入大的种种秘事，大至与林杰、吴传启的种种关联，小至公社的每一次会议、每一个部署、每个人的发言、每一通电话……

呜呼哀哉！此等卧底能力，此等投名状之细备，着实令人不寒而栗！从小报记载来看，两派都有“叛来叛去”之人，这也是文革派性之下人性弱点的大暴露吧。

至十二月中，仿佛上一年的历史重演，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造反再造反，从八一八到新人大，似曾相识……

他叛由他叛，新人大总部自有脱身大法，那就是迅速切割。

9月11日新人大公社召开《打倒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掀起革命大批判新高潮大会》，借“热烈欢呼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发表”之机，找到说辞，把肖前说成是与陶铸一样的“反革命两面派”式的人物，借以与肖前斩断切割，脱身自保。会上，公社负责人张祖义代表总部指出“混进我们队伍中的肖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陶铸式的反革命两面派。在中央文革的亲切关怀下，反革命两面派肖前的揪出，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也显示出我新人大公社无比坚强和巩固。以前由于我们警惕性不高，没有及时地识破

肖前这个反革命两面派。今后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教导……”云云。

9月12日新人大公社召开斗争肖前大会，报道称：

“九月十二日下午，新人大公社全体战士坚决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办事，满怀对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无限忠诚、无比热爱；满怀对阶级敌人的刻骨仇恨，在公社委员会的组织下，召开了斗争三反分子、反革命两面派肖前大会，无情地揭露了三反分子肖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这个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也打击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妄图利用肖前问题打击我新人大的罪恶阴谋。”

新人大之于肖前，从九月一日的“拼死相救”，到十余天后的高帽子、喷气式伺候，唯紧跟而已。历经年多的革命淬炼，还能学不会一些“翻脸比翻书还快”的能力。

新人大向何处去？正如赵桂林九月二日决心的“我们也得把人员集中一下，占几个楼”“武斗了。”人大两派大规模武斗自此开始。

人民大学的武斗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抓人比赛到割据形成 自67年9月1日三红抓肖前始，至11月底北京卫戍区派出的军宣队主持下双方签订制止武斗协议止。

王、关倒台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旋即又演化成一波更大狂澜，关联派系的各群众组织被认定为五一六组织，他们的头头都被定性为五一六组织的坏头头。

1967年9月1日，陈伯达、康生接见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首都部分红卫兵组织，发出：“对五一六组织的坏头头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专政机关和广大群众结合起来”的指示，并提了一个名单，将林杰、赵易亚、《光明日报》总编穆欣定为反党小集团，将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等几十人都列入反党集团内，让革命派抓捕他们。

在一系列问题上频频被动之时，新人大迅速从“抓5.16”这个大事变中找到了翻盘机会：原本三红就有反康生、反总理的“前科”，这些可以重新翻出来戴上5.16帽子；至11月初新人大又发现了三红一个主要成员王昆顺的“5.16”

分子（后来查明，“5.16”纯属四人帮虚构的一个“反动”组织）嫌疑，新人大遂于11月11日诱捕王昆顺，给了三红猛烈还击。

王昆顺是人大新闻系五年级学生，又是三红新闻兵团负责人、三红政治部主任、东方红公社负责人之一，67年2月至6月调红旗杂志社工作。在他担任记者期间，参与了二外“五一六”分子串联会，二外“五一六”分子张广武、吴昂等人被揪出后，交代并揭发了王昆顺、王英明的问题，早在两个月前三红总部就已知晓但予以包庇。

11月11日新人大在人大西门诱捕王昆顺，三红随即报复，出动大批人把南一楼团团围住，抓走新人大战士严刑毒打。这是两派殴斗中的一个高潮事件。

此前九、十月间，两派互抓并毒打被抓者事件就已时有发生：

三红称：人大共揪出阶级敌人254名，其中由我人大三红揪出的就达236人，占全部的92%。

新人大称，运动中已经连续揪出了潜藏在我校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叛徒、走资派、反革命分子二百六十余人，其中参加三红的就有二百二十余人，占百分之八十五。

一时间校园内血雨腥风，两派同学都不可能再在自己本班本系原来的宿舍混合居住了。以共青团路为界——三红一派学生、教职员集中到了学校的南侧，教学大楼南面的南楼等处居住；新人大一派学生、教职员集中到了学校的北侧，图书馆大楼北面的北楼等处居住。

在“一一·一一”三红围攻南一楼、“一一·一六”新人大攻占红一楼两次严重武斗事件之后，虽然十一月十八日在卫戍区的主持下，双方签订了制止武斗协议，要求：双方无条件地“拆除全部武斗工事”“交出一切武斗工具”“不准以任何借口抓对方的人”“已抓者一律释放”“一律搬回原单位、原住处和原来办公位置”“恢复到今年八月份的情况”……但是，在两个山头依然同样被中央文革认可，两“大王”仍旧同存并立的情况下，“涛声依旧”——山头各自为政，群众各归各派。至11月底割据基本定型，“楚河汉界”势成，为武斗今后的进一步升级摆开了战场。

第二阶段 从备战加剧到激战终结

自68年3月27日打倒“杨、余、傅”起，至8月22日第三批军宣队进校，

取缔群众组织止。

大革命的车轮风驰电掣，1968年3月又突然发生了杨、余、付事件。打倒杨、余、付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五个战斗回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说成是王、关、戚的后台、是刘、邓、陶的余党、小爪牙。

“军阀重开战”。已经适应了这种大翻个儿的尖锐对立的两派，立即紧张起来，一方面积极备战，一方面伺机进攻。双方都在积极寻找对方的把柄，把对方往“杨、余、傅”的黑线上拉。

新人大发布：“杨成武反党集团与人大三红总部是什么关系？——十八个为什么”，三红还报以“三十六个为什么？”双方打开高音喇叭对骂，十二小时不停歇。

据三红揭发：“‘三·二七’大会以后，人大公社的武斗准备逐渐达到了高潮……他们……盗用修建科仓库大量钢材，打制长矛一千多支、匕首四、五百把。四月份又拆掉校园四周的铁栏杆作钩镰枪。并非法砍伐大量树木；出动大卡车装运砖石；动用公款17万元购置武斗用具。四月二十七日晚八时许，他们竟然在交通股一带试验了炸药包、毒气弹。”

新人大称：“五月十日，他们（指三红）在得到解放军宣传队即将离校集中学习的信息不到两小时，就用法西斯手段非法绑架贫农出身，曾经参加过八路军的我新人大革命工人李德山同志（注：此人与前述哲学系学生同名），从而打响了武斗第一枪。”

小报记载下的“‘三·二七’之后的备战升温”和“‘五·一〇’之后的战幕重开”使我们发现了问题的关节点，那就是四十余日中卫戍区军宣队作用的缺位。

上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双方尚能在卫戍区的主持下，签订制止武斗协议。十一月二十五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还来校做过视察，检查协议的落实执行。当时卫戍区派驻了第一批军宣队进校，“支左不支派”，督促两派联合。68年2月16日卫戍区派驻的第二批军宣队进校。

三月，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突陷“新反党集团”案件，卫戍区下派各校军宣队的处境顿显尴尬。于是，校内仅存的一点居中调解的力量化为乌有，两派故态复萌，新一轮的“抓黑手”角逐开始。直至五月十日第二批军宣队离校集中

学习，权力位置彻底真空，三红迅疾抓走新人大方面武斗队的主力工人李德山，双方夺人大战，互指对方“打响了武斗第一枪”。

自此，恶斗连续升级、不可遏止。启开其后的“五·一一”、“五·一二”“五·一四”“五·一七”、“五·二二”……终至酿成五人惨死的命案！

逝者的血终于敲响了警钟，双方此后没有发生短兵相接的状况。六七月间，双方互相偷袭，捣毁前沿工事；用大弹弓隔楼对射，有人被击中。也有人使用过手榴弹、步枪，幸未造成伤亡。

7月27日，数万名工宣队员在解放军的配合下，突然开进清华大学占据校园，与学生发生冲突。工宣队员死五人。

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见北京高校“五大造反领袖”。告知：“你要抓黑手，那个黑手就是我，工人是我派的。”“如果谁再不听劝告，谁就是国民党，谁就是土匪，就歼灭！”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有两处提到了人民大学，一是说“‘人大三红’反谢富治，总部不出面，叫一个小小的战斗队出来”；二是说“我看赵桂林不是反革命么”。

8月22日，以人民机械厂为主的工军宣队进驻人民大学，开始实行“大联合”。师生员工各回原来系、部，由工军宣队领导。两派组织头头集中办学习班，审查有无杨、余、傅黑手问题。

红卫兵组织就此星散，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工军宣队进校前，新人大公社报《新人大》出版了最后一期——第77期，在头版发表“辛任达”的署名文章，对人大两年来的红卫兵运动做了总结，题目是：“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文章说：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并支持的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八、九月份，在首都出现了三个红卫兵司令部。与此相应，人民大学也出现了三个代表不同政治派别的红卫兵组织。这就是一司人大红卫兵，二司八一八红卫兵，三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三个红卫兵组织的存在及其演变，深刻地反映了人大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

八月八日，由反革命两面派刘志坚的狗女刘平凡等黑帮子女发起的人大红

卫兵，在反革命分子傅秋涛的家里撕毁一面五星国旗做袖章而秘密成立了。不久就成了一司重要成员，刘平凡还当了一司第一副总指挥。它就是现今反动臭老保“人大三红”的前身。

八月二十日，庞大的保守组织“八一八”红卫兵在一片“保郭”（影秋）声浪中成立了，不久，就成了红卫兵二司的发起者和重要成员。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在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激烈搏斗中，新人大公社的前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正式成立了。她高举着“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从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立即加入了首都三司的战斗行列。

这三个组织，由于在对待两个司令部对待旧人大、对待广大群众等原则问题上，各自的立场不同观点不同、态度不同，因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殊死搏斗中，起了不同的作用，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原首都二司八一八红卫兵，由于它逆革命潮流而动，死保文革命修正玉义分子郭彤秋。一开始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迅速崩溃了。

原首都一司人大红卫兵的广大战士在大造郭影秋之反的斗争中，做了一段革命的同路人，但是，由于其总部被陶铸的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左右，它的组织从上到下逐渐被刘邓陶在人大的代理人孙泐特务、叛徒、反革命集团及其第二套黑班子聂崔朱铁地下黑党委和坏组织红卫队所控制，死保旧人大，死保刘邓陶，疯狂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终于重蹈八一八红卫兵的覆辙，陷入了反动臭老保的罪恶泥坑。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要革命的人大红卫兵和红卫队的广大战士，继人大红卫兵法律系中队“一·一四”暴动踢开总部之后，又一举推翻了人大红卫兵、红卫队总部，成立了《人大红卫兵造反委员会》《人大红卫队暴动委员会》，直到六七年三月初，才在地下黑党委的操纵下，把东方虹公社、红卫队、红卫兵捏合在一起，并由戚本禹亲自命名为“人大三红”。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正当八一八红卫兵彻底垮台，人大红卫兵日趋没落，一度垮台的时候，我三司人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却从小到大，越战越强，迅速地成长壮大起来。

正是她，在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坚定地站在毛生席司令部一边，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进行了口诛笔伐，对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

总是挺身而出，迎头痛击：

正是她，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分析了我校十七年阶级斗争的形势，在人大红卫兵投入敌人的怀抱，妄图将革命半途而废的严重关头，坚持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彻底革命立场。

正是她，向刘邓在我校的代理人、旧人大的大小阎王王孙、郭、胡、聂、崔、李之流，向盘踞在我校的国民党残渣余孽、一小撮特务、叛徒、走资派，向十七年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并批判了死保刘邓黑据点旧人大的种种保皇谬论，胜利地进行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正是她，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保护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采取了团结、教育、争取的正确方针，得到了全校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支持。

以原首都三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主体的新人大公社，尽管经历许多艰难和曲折，但她始终是人民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派，而敢于对抗革命洪流的八一八和人大三红总部，尽管他们喧闹一时，终究不过是无前途的“支流派”“逆流派”而已。

事实就是这样，谁无限忠于毛主席，谁始终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谁就一定会胜利；谁违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潮流而动，谁就一定要失败。”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重读这篇颇具人大文采的文辞精锐、逻辑无懈的文章，不知做何感想？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四日

【述往】

我经历的人大文革当中的几件事

张联瑜

1966年6月1日，中央发表了北京大学的七人大字报以后，在6月4号或者是5号之间晚上把我们学校的校系领导都批斗了，一夜之间所有卫生间的废

纸篓都没了，当高帽子给戴上了。这时候我们思想转过来了，认为这样对待干部不对。6月15号我们学校自发的批判那些造反派，当时叫抓游鱼，在文化广场批判他们。那时候上级派的海军工作组已经来了，海军工作组的领导讲了几句之后，就把批判的造反派押走了，中午就放了这些人。

6月15号过了以后，大家对六一五大会会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好得很，比如说我们，抓游鱼嘛，打击造反派。而造反派说是白色恐怖，前后辩论了半个多月，我们（国政系四年级在留学生办公室工作的朱忠仁、张联瑜、丁雪荣、黄民成四位同学）写了一篇长长的大字报，12500字，贴在新教学大楼围了一圈。当时有人开玩笑说：“戴眼镜，自带小板凳，看国政四的‘一二五’大字报”。当时矛盾集中在郭影秋问题上，学校分成两派，一派说郭影秋是好干部，另外一派说郭影秋是黑帮，是修正主义分子。这个时候产生了人大红卫兵，大概七月份左右。

人大“三红”之一的“人大红卫兵”成立于1967年的7月份，发起人是几个干部子弟。他们当时也没有袖标，把一个红旗撕了以后戴在袖箍上，主要的目标就是反郭。当时人大的同学、教师、工人，百分之九十都是保郭影秋，因为郭影秋这个人，第一工作很负责任，第二密切联系群众，第三不搞特殊化。你看他在困难时期，给他发的那些高干的票证，什么点心、鸡蛋、糖等的购物证，他都没用。从南京往北京调的时候，秘书收拾他的东西，从办公桌内发现所有的票证还在那儿放着，一张都没用，所以广大师生员工都觉得他是好干部。

今天我讲人大文革中的三个事情。这些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的，而其他同志们都不知道的。根据时间顺序，我说一说。

第一个事情就是1966年7月29日，我接待中央文革派到人大的陶鲁笏、张经武两位领导的事情。

当时中央已经决定撤销工作组，来我校的海军工作组已经撤了，我们人民大学是无政府状态，没人管。我当时思想很沉闷，关心国家大事。当时想，什么时候能见到毛主席，给毛主席反映反映呀！这天上午我在学校办公楼，也就是老教学楼前的广场上来回转，一圈一圈地转，转了有四五十分钟吧。九点左右从东校门进来两辆小汽车，一辆黑色的，一辆灰色的，都是上海牌。到了办公楼停下了，我一看每辆小汽车上各下来一个人。我就走过去了，别人都没注

意。第一辆车下来的是一个胖子，高高的，大概一米八左右。第二辆车下来的是一个老头，很精干。我走近以后，老头从后面上来给我介绍说：“同学，这位是陶鲁笏同志。”当时我知道了，陶鲁笏是山西省委书记，中央委员。那个大个子马上介绍后面的那个人，他说：“同学，这位是张经武同志。”张经武我当然也知道，西藏工委书记，中央委员，那是很出名的。因为我老家是山东，抗战时期张经武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他们向我说：“同学，你们学校现在还有人负责吗？”我说没人负责了，无政府，工作组撤了，党委都打倒了。他们说那你看能不能把会议室打开，找一些同学咱们去交谈交谈。我说可以啊，会议室一直开着，没人管啊。

我就带他们到了二楼大会议室，这儿可以坐一二百人。正好公务员在，打来开水，一会儿就跟着来了很多人。我就给大家介绍，他叫张经武，他叫陶鲁笏。大家也都知道他们两个人的身份，一下子围了一二百人。我在中间，他就跟我交谈，人民大学怎么样啊，文化大革命怎么样啊，现在回忆起来是在套我的观点，打听我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

他们来是干什么呢，他们两个跟我讲，他们是中央文革派来的。为什么来呢，就是7月29号这一天中央要在大会堂开大会，要求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也就是造反派参加。这个会议名字就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他跟人民大学联系，联系不上。要党委党委没人接电话，要工作组工作组没人，无政府嘛，没人去领会议票，所以把他们两个派来了，两个中央委员来送票。他们第一个接触的就是我，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他一看我的观点亮出来了，是保守派。之后他们就说明了来意，是中央文革叫他们来的，了解情况。再一个是下午人民大会堂要开会，要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大家就跟他们要票，他们不给，我跟他们要票他们也不给，听我话中不是积极分子啊，是保守派。后来大概有二三百人同他们交谈，有的说郭影秋好，大部分还是说郭影秋好的。后来把参加会议的票交给谁了，我记不太清楚。反正是交给一个负责人了吧，由他分到各系去。

这时候我就反复说你给我张票的理由，我说我很想到人民大会堂，肯定毛主席是要出面的，我还可以见到毛主席，我现在思想很苦闷的。二位领导说不给我，那不行，上面要我们给积极分子啊。特别是陶鲁笏，态度很坚决。这个

时候已经到了12点半，该吃午饭了。我就说先吃中午饭，你们也得吃饭。就在我们这儿吃饭吧。他们两个就说好啊，尝尝人民大学的饭，我就带着他们到了哲学灶饭厅。

当时很多人跟着，我给他们买了饭，有馒头，也有窝头，还有菜。碗是借用同学们的，给他们两个人各打了一份菜。两个人都争着吃窝头，老同志很接近群众，战争年代成天在群众家吃饭。很快和群众接触起来了。陶鲁笏、张经武拿着窝头以后，把窝头揉碎了放在菜里，拿勺子一搅和就这么吃。老百姓很多吃饭就这么吃，这种吃法挺接触群众。吃完饭临走了，我说不行，你还得给我票，我说你看看，这是我接待你，没人管，饭票还是我出的。后来半抢半送给我一张票。下午两点，在东校门大松树下集合，那时派了一辆大轿子车，大概一共三四十个人。到底怎么分的票我不清楚，反正我是搞了一张票，我们班是李金海去的，他的这个票就是分的，他是党支部书记。

当时参加会的人不多，一个系三五个人吧，全校十来个系。7.29这天大会，我印象中熟悉的就李金海一个人。我们坐上车就去大会堂了，从北门进的。我们坐在大会堂的二楼前边。进去看到主席台已经坐了很多，很明显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几个是坐在左边，什么董老啊、朱德啊、陈云这些人都坐在右边，中间闲了几个位置。江青来了，她穿了一身灰色的海军服装，很活跃。总理就指挥大家唱歌，什么“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歌曲。大概半个小时后就开会了。开会时中间那个位置没人坐，毛主席没来。我很想见毛主席，可毛主席没来，当时很失望。

这个会叫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宣布了撤销工作组。主持会的是李雪峰，李雪峰是北京新市委书记嘛

第一个讲话的邓小平，其中心内容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讲完话以后总理讲话，每个人大概半个小时四十分钟的样子，总理讲话就显得坑坑磕磕的不流畅，原来总理口才很好啊，讲话都是即席讲话没有稿的，怎么讲的这么坑坑磕磕的呢？后来我分析，当时这个话不好讲，要慎重的表态，慎重的用词。总理讲话内容是什么呢，其主要内容就是大道理管小道理。他说：“你们不要打架，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一发火就撸袖子，要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总理讲的主要内容。总理讲完了刘少奇讲话，刘少奇讲话的中心内容是“文

化大革命怎么搞，你们不晓得，我也不晓得”。他反复讲，文化大革命过去没搞过，没有经验。讲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刘少奇讲话以后毛主席出来了，原来毛主席在后台，一开始没上去。毛主席出来以后向大家招手，从台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走到这边，最后在中间坐着。这时整个会场沸腾了，大家高呼万岁，跳着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坐在那里，大家不走。主持人宣布散会，大家还是不走，高呼万岁，还有人大喊：“情毛主席讲话！”。后来总理指挥大家唱了两个歌，最后散了。散会后好多老领导走到毛主席面前都跟毛主席说句话，蔡畅这些老同志大家都认识，走到毛主席前面问候问候，都走了。这就是7.29大会。后来这个会上的三个讲话，作为重要内容向全国传达。8.18以后，我串联到了山东，那里还在用留声机放中央发的唱片，组织各级干部收听7.29大会的这三个讲话。

第二个事情就是谈一谈八一八红卫兵建立初期的一些事情。

八一八是怎么建立的，人民大学说法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同志说八一八红卫兵是在吴老吴玉章指导下建立的，这个说法有一些出入。我是八一八红卫兵的第一发起人，也是第一任政委。干了没几天，一个星期多吧。我们没有接到过吴老要求成立红卫兵的指示。后来有一次我跟我们班朱忠仁同学谈起这件事，他说他在搞“东生联络组”时，听吴老说过，你们保郭的同学也要成立红卫兵。“东生联络组”是以朱忠仁为主，几个系少量同学建立的保郭组织，主要是写些有关保郭的书面材料。大约是7.29大会之后建立的。“八一八红卫兵”建立后，朱忠仁又同国政系老师唐立春（时任国政系留学生班班主任）及学校工人刘洪斌等人，建立了人大工人、教师、干部参加的“赤卫队”，也是以保郭为目的。“八一八红卫兵”和“赤卫队”建立后，“东生联络组”就停止活动了。我们成立红卫兵时没有听吴老说过这话，也不是吴老的指示，要把这一点说清楚。

一开始人民大学有一个红卫兵，叫人大红卫兵，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其宗旨就是打倒修正主义分子郭影秋。这个红卫兵是几位干部子弟建立的，我们当时对他们不感兴趣。他们用一面红旗制作了几个红条条戴在胳膊上，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大家都觉得大学生哪儿有搞这个的，这不是小孩子的事情嘛。因为当时红卫兵是从中学开始的，大学没有红卫兵，所以大家不感冒，也没有再想成立红卫兵。为什么后来又要成立红卫兵呢？这个要从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

卫兵说起。

在海军工作组撤销以后，当时中央指示各个学校成立文化大革命大联合筹备委员会，叫大联筹。大联筹分两个层次，校一级是管全校的，由各系选代表参加。系一级是管本系的，由所在系的各年级选代表参加。

当时国政系里也有一个大联筹，我是系大联筹委员会成员之一。大联筹建立以后。每一个委员每周负责一天的值班工作，守电话、联系什么事等等。

1966年8月18日这一天正好轮到我值班，所以参加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大会，国政系由我带队。我们是走着去的，没乘车。晚上多吃点儿饭，一人给一个馒头，凌晨两、三点钟就出发了，到天安门广场有三十里地，不到六点就到了。我们学校的位置是在文化宫门口前头，这时有一个人找我，可能是校大联筹的什么人吧。说你们系找一个同学，最好是党员，有一点事情。也不知道干什么。我说我去。我当时认为可能出点儿什么体力活，哪个地方需要搬东西、维持秩序等方面的事。他说你不能去，你还得带队呢，这会儿我班同学沈大德在我旁边，他说他去。我说行，他是预备党员，走吧。沈大德就跟着是一帮人走了。沈大德后来跟我讲，没什么事情干，只是向前走。过了金水桥了，过了金水桥又往天安门里头走，到了天安门里头从左边上了天安门城楼。沈大德就上了天安门，还跟毛主席握了手。回来以后大家都很高兴，你见到毛主席了，跟毛主席握手了，很羡慕他，都跟他握手。我们在文化宫前面看毛主席看得很清楚，看毛主席穿军装了，而且也看着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标了。我当时脑子里一震：毛主席承认红卫兵了！看来我们回去必须成立红卫兵。为什么呢，对立面反郭影秋那边早成立红卫兵了，我们保郭艳秋的这边还是一片散沙，没有头头。当时脑子很清楚，就是必须要跟对立面合法斗争，没一个组织不行。回学校的路上，我一路走一路想怎么成立红卫兵。到学校以后

我就叫许寿明到我系住的六处外小树林等我。在小树林我跟他讲，我说老许咱们必须马上成立红卫兵，现在看来我们进行合法斗争得有一个说法。人家有红卫兵了，我们没有怎么行，马上成立红卫兵，他很支持我的观点，他说你说的对。我们马上找李金海商量。李金海是国政系四年级党支部书记，当时还得找党组织，真正后台是李金海。李金海一听很有道理，表示坚决支持。

我们马上到系党总支办公室，一下子就把我们班七八个党员召集来了。我

印象有李金海、我、许寿明、张锡林、林俊德、伍连连，还有沈大德。大家一致同意马上成立红卫兵。我们学校共12个系，除了国政系，还有十一个系，就派了十一个同学到各系去联系。实际上这个时候各个系也正在酝酿成为红卫兵，都在酝酿，但是没有考虑到在全校成立，都想自己班、自己系里成立。我们联系建立全校的红卫兵，一下子国政四就成了牵头单位。当时各个系热烈拥护，大概一点多不到两点，各个系派的代表来了。我记得当时的代表有：新闻系朱卫卫、财贸系王凤林、农经系杨似林，还有农经系的徐永建，后来这个人当红卫兵团长。

1966年8月18日下午两点，在国政系党总支办公室，全校12个系的代表，与国政系四年级以李金海为首的七、八位党员，一起研究成立保郭影秋这一派的红卫兵的问题。关于建立红卫兵的宗旨，大家客套话没有，就是保郭影秋一条，同意郭影秋是党的好干部的加入红卫兵，不同意的别加入。对立的目标就是的反郭影秋的人大红卫兵，

回去以后各个系马上建立红卫兵组织，系再到班，建立以后到这里来汇总。最后关于红卫兵的名字费了心思。大家说叫什么名字啊？咱们不能叫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啊，我们的对立面已经占了这个名字了。有人提出叫“红旗”，还有的人提出叫什么“战斗团”，大家都不满意。这时有个女同学，大辫子，突然说了一句：“今天是八一八，咱们叫八一八红卫兵。”名字是这么来的。那时候任何学校和单位还没有叫八一八红卫兵的，不像后来。在同一天，毛主席头午接见的，一两点钟开会成立组织，谁也难以想到叫八一八红卫兵啊，但是这位女同学想到了。八一八，好，就叫八一八，就通过了。开会开到四点这个时候，就散会了。

散会前大家推举我当政委，团长就推举徐永健。散会不长时间，吴老的秘书同志王宗伯来了。王宗伯消息很灵通。他找到我，说你现在跟我到吴老那儿去。我们马上坐吴老的车到了东四，到了吴老家。吴老那个院子是四合院，一个前院一个后院。前院是警卫，部队全穿蓝衣服，不穿黄的，但是同解放军服装的式样是一样的，什么口袋啊、帽子都是同样的。

吴老在里面院北屋正房里，坐在一个沙发椅子上，腿上盖着羊皮。他腿疼，夏天腿上盖着羊皮。王仲博说你把简单情况汇报汇报，我就把现在建立红卫兵

的必要性对吴老说了，因为要进行合法斗争，就必须成立一个组织。我们成立的组织的名字叫八一八红卫兵团，大概有一千多人吧。吴老听了很高兴，就说郭影秋是好干部，“谁反对郭影秋谁就是反革命”。我就跟吴老说，吴老，我们红卫兵团大家一致聘请您为名誉团长，吴老回答：“行。我给你们当团长。”吴老这个名义团长就是这么定下来的。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我们就走了，还是坐的吴老的车。记得我不止去了吴老家一次，至少是两次。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八二〇大辩论的事情。

1966年8月20日晚上，我校对郭影秋问题进行了第二次大辩论。这时八一八红卫兵只成立了两天。两派红卫兵都派代表在台上，我是八一八红卫兵的政委，作为代表在台上的左边，人大红卫兵的代表在台右边，是谁我也不知道。辩论大会的组织者当时不清楚，现在回想应是人大校大联筹。（从表面看应是这样，实际应是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的，因为来了很多中央领导。）出席辩论会的中央领导有：陶铸、李雪峰、陶鲁笏、张经武等十几个人。

邓小平原来准备来的，后来没有来。在这之前已开过一次大辩论会，邓小平和陶铸都出席了，都讲了话，大约有几万人。四百米跑道的大操场人挤得满满的。邓小平这次为什么没来？这和八一八之后中央领导班子改变有关。第一次大辩论时，邓是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第七把手，陶铸是排在后面的。这次大辩论，八一八之后，陶铸已是中央第四把手，大大排在邓的前面。我记得陶铸走上台后，在我身边路过，他的秘书同他讲：刚才小平同志秘书来电话说，小平同志不来参加会议了。这话我听得很清楚。

陶铸来了以后好像是很不耐烦，显得和第一次那么谦虚不一样了。他上次讲话中说：“小平同志是老革命吧，我算是中革命。”这次就不行了，他是第四把手了，对农民老批评，我们就很烦他了。当时台下有几百名农民，他们是北京郊区苏家坨的。郭影秋带着人大的学生在那里搞“四清”。因为郭校长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农民们都拥护他。听说有人要打到他，就自觉派代表来参加大会，保郭影秋。

当时发言是这样安排的，反郭派发一个我们发一个，我们发一个他们发一个。我为什么在上面呢？就是指挥谁发言，辩论嘛。大概讲到两三点的时候，

陶铸走上台讲话了。我对他的讲话有意见，老是批评农民，数过来数过去什么的，同毛主席著作上不一样。特别是毛主席井冈山时期讲的观点：“没有农民就没有革命，否定农民就是否定革命。”毛主席讲的很多。我从小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来，我就写了：“陶铸同志，相信你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但是毛主席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反对贫农就是反对革命’，你今天批评农民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来支持人民大学，保郭影秋这个好干部，他们有这种权利。”我签上我的名字，给在我边上喊口号的李建国看了看，李建国看了以后说：“好，我同意。要不要我签名？”。我说“不用你签名了”，我怕惹事啊，李建国是党史系一年级的一个同学。

前面第一排坐的是十来个领导同志。字条一个一个传过去，大概传了五、六个人吧，到了张经武那儿，张经武脑子很精明，他看了看，又回头看看我，不说话。把条子压在他桌子上，不给陶铸看也不给递。大概过了20几分钟吧，我说怎么回事？我火了，我这脾气挺急，抬起屁股我就上去了，谁也没注意我上去。我一把从张经武手中夺条子，就给陶铸了。

陶铸他看看，问谁写的，我说我写的，陶铸就发火了。他批评我说：“你们懂什么，农民问题，中央都知道了。”这是我从陶铸那儿学习到的一句话，“中央都知道了”，就是指毛主席都知道了。那时候咱们大学生不了解，后来才明白，所谓“中央都知道了”，是指“毛主席都知道了”。他就是这样讲的，批了我一通。他一批我就不干了。我就说“农民怎么了？”你一句我一句，不算辩论算争论吧。争了七八分钟，台底下学生、群众不干了，好多群众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下面好多人呼口号：“穿白衣服的躲开！请领导讲话！”当时我穿着白衬衫。听到下面呼口号，我就下去，退下来了。退下来时放桌上的字条我就顺手拿走了，没给他留下。我当时脑子挺精明的，放在手里留个底儿，免得以后追究起来口说无凭。

陶铸后来几次讲话还提到这件事，在北师大他就说过：“人民大学有一个筹委会委员，说什么我‘反对农民’，我怎么会反对农民？我打倒了中南三个省的地主。”当时他是中南局书记嘛。

八二〇辩论后第二天，学校的大字报就出来了，“谁反对陶铸谁就是反革命！砸烂他的狗头！”两个月后陶铸也被打倒了。

当时我还是一直把这个条子留着的，留起来准备以后有人找我，说我反对陶铸，我可以证明我反对的是什么东西。我说我不是反对，是提意见，提意见总可以吧，我不是先称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嘛。

1966年“八二零大辩论”之后，我还代表我们八一八办了一件事情。当年的八月下旬初，江青出席了北京市红卫兵司令部（一司）成立大会。“人大红卫兵”参加了这个司令部，我们“八一八”不是。还有其他很多学校、很多红卫兵都排斥到外面去了。大家就联合起来，到中南海告状。我就代表咱们八一八红卫兵参与了告状，就在8月23、24号这几天吧。

我们一二百人到国务院西门，在那儿吃了两、三天饭。到时候有人给你送饭去，都是好饭，什么猪头肉卷烙饼啊，什么小站米饭红烧肉啊，净吃好的，吃完签个字就行。最后到了24、25号吧，突然来了一个人，大家都不认识。其实是戚本禹，他那时还不出名。

他把我们带到中南海西门外的一个小学校里，在一个小学校的教室里接见我们，给我们讲话。因为江青参加了一司成立大会，大家就说了一些对她不满意的话。戚本禹批评大家说你们不要对江青同志这么不尊重，他说我们可以成立二司嘛。不久后，中央又开大会成立了北京红卫兵第二司令部，江青又参加了大会，这么才出来个二司。

关于我退掉八一八政委一事，情况是这样的：

我在发起成立八一八红卫兵之后，政委只干了不到十天。当时，特别是在和陶铸争论之后，我清醒地看到，文革是对着老干部来的。我父亲是老干部，家中三位烈士，对老干部有感情，打倒哪一个也不愿意。群众组织头头不是干部子弟能当的啊！于是决定退下来。我跟李金海谈话，后台是李金海啊。我说：“老李，不行，政委我不能干了。为什么呢？这个运动对着老干部来的，我本身就是干部子弟，我有天然的感情，你说我能批判谁？”这样国政四支部书记李金海找贫下中农出身的张锡林谈话，由他接任政委一职。

此后，我再没有在组织上参加什么派别，但保郭影秋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仅参加后成立的“新人大公社”的一些活动。武斗开始以后，我就到一位中学同学所在的一家工厂劳动去了。直到一九六八年七月中央派工宣队进校，我才回到学校。半月后，分配工作离校。■

【述往】

人民大学的“二月兵变”风波

陆伟国

我是中国人民大学62级学生，经历了文革的狂风恶浪。“二月兵变”，是文革初期极左势力想借刀杀人而歪曲事实蓄意炮制的一个极其卑劣的阴谋。当时，在人民大学校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

事情是这样的，1966年2月4日，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在北京市新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3月2日北京军区命令63军188师负责组建。该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为此，卫戍区先后到各处找房，均无结果。海淀区武装部便向他们介绍说，有几个大学的学生都下乡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是否可去联系暂时借用。当他们到人民大学联系时，被郭影秋（人大党委书记、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婉言谢绝。后来，卫戍区也认为部队住在学校不合适，而住到南苑的一个靶场去了。（请见：《‘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李可、郝生章着，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这件事，极左势力得知后喜出望外，以为找到了一颗大炮弹。因为林彪刚在5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个“政变讲话”，这下又有了“实例”，岂能放过。6月17日，有人在北大贴出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以此诬陷彭真、贺龙要搞军事政变。如果是这样，郭影秋也就牵扯在内，成了“二月兵变”的黑干将。虽然这内容事关重大，但因过于离奇，信的人并不多，一开始在人大校园内影响不大。康生一看不行，便从后台跳到了前台。7月27日，他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信口雌黄地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这个大

黑帮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

这一下，形势突变。第二天晚上，郭影秋就被造反派揪回学校在新饭厅批斗。震天的大喇叭，把我们都吵了过去。主持大会的人，狂吼着：“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头子郭影秋必须交代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郭影秋还是很冷静，在一鞠躬后，对人民大学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他来人大以后的工作和不足，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说明。一直讲了二个多小时，讲得非常令人信服，至少对我是这样，以至于跟着呼喊口号的声音越来越少、越来越散。但是会后，郭还是被押到我所住的宿舍东风三楼底层，法律系的男生宿舍（就在新饭厅旁边一点）。结果，大批不赞成批郭的学生、员工尾随过来围在楼前，我也在其中。直到黎明将至，人数越来越多，人声鼎沸，争吵不息，情况渐渐趋向激化。有的等不及要冲进去抢人，有的则比较策略，提出我们也要批判校领导，为什么只能你们批，不允许我们批啊。最后，造反派只得把他放出，这边的人把他转移到了农经系的学生宿舍。这是人民大学在文革中第一次比较激烈的直接对抗。

二

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7月29日，郭影秋被撤销了刚担任二个月的北京市委书记职务和作为华北局代表列席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资格。郭影秋是人大广大师生衷心崇敬的校长，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对他因受“二月兵变”的牵连而撤职，我们很想不通。当晚，我们正在文化广场上看大字报（文化广场：原办公教学楼北侧的一块空地，当时集中贴大字报的地方），消息传来，大家为此实在气不过，一时群情激愤。不知谁喊了声：“我们到市委去要个说法”。马上一呼百应，迅速聚拢起几百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台基厂的市委大楼径直而去。此时的市委大楼里，灯火通明，彻夜不灭，人进人出，川流不息，很有点像电影“列宁在十月”里的斯莫尔尼宫的意思。进去之后，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原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大学工委的陶鲁笏（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张经武（原西藏工委第一书记）等先后出面接见我们，作了一番说明，但都是推托之

词、不得要领。

彻夜不眠之后，我们一行上百人，又从市委去了北海西侧的中央文革住地找康生。那是清代某王府的一个大院，灰砖灰瓦，很庄严也很深沉。进北门，过照壁，穿过院子，进得一个厅堂。里面光线很暗，窗帘没有拉开，开的电灯也很小。摆着几十张椅子，坐不下的人站在后面，前面长条桌后的沙发椅还空着，大家都在等着。

过了一会，一个矮胖女人从侧门进来，满脸堆笑地说：“我是曹大姐。”这是他老婆曹轶欧先出来挡驾。她说：“康老现在一天到晚很忙很辛苦，刚睡下不久，你们要等会儿。”接着她又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了一会，明显在拖时间。

我们坚持不走。许久，一个干瘦的老头在侧门出现，因为光线暗淡，看不清什么，只能看见从他眼镜片后面露出的光也像这屋子一样地阴暗深沉。这就是康生。他是满心不愿意，又不敢当场说狠话，也是含糊其词、推诿敷衍。面对同学们提出的关于“二月兵变”很多很尖锐的问题，他很有一番推功，没有一一作答，而是讲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要理解和相信中央的部署，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等等等等。对郭影秋的问题，他也不做正面回答，只说郭是做过一些工作，但是跟不上形势了。这些话，跟他之前之后讲的另一一些话，就不一样了。见到康生，用阴森两个字描述最为恰当。阴森的院子，特地弄得灯光很暗淡的阴森的大会议室，那黑黝黝的阴森的脸盘上透过反着光的眼镜，是那黑黝黝的阴森的眼神。

等回到学校，已是连续两天两夜没合眼，这一生还没有过。进了宿舍倒头就睡。

三

这么重大的事，当然惊动了高层。接着，8月2日夜，人民大学举行就郭影秋和“二月兵变”问题的大辩论会，作为当时中央全会有一个现场观摩会。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许多与会者都过来了，党的高层领导几乎在人大集体亮相，当然，和我们一样，都坐在下面。全校所有的师生员工都来了。大操场上，密密麻麻，人头攒动。大会由吴德主持。正反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精彩之处，掌声雷动。亮出不同观点时，台上针锋相对，台下喝彩声、倒彩声，同时四起。那一阵阵声浪，震动四方。这真的是场辩论实战，不像现在

有些辩论，很大程度上是在作秀和表演。不过，尽管辩论很激烈，基本上还是有理说理，有讽刺挖苦，但没有谩骂攻击。文化大革命，在这一晚上，还有最后一点“文化”的意味，但很快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政治风浪也能锤炼和涌现出一些不凡的人物。这次辩论会上，就有一位国际政治系63级的女同学吴廷嘉表现出色。她口才极佳，发言时滔滔不绝、出口成章、言辞犀利、精彩不断。一时间成了校内名人，被戏称为“吴老娘”。她后来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幸于1997年病逝。痛哉，又一位人才的离去。

那天，直到半夜后，辩论大会才结束。回宿舍的路上，大家还都边走边争论，个个都是那样的激动。几十辆黑色轿车，从我们身边缓缓驶过，这在那时也是极少有的场面。有眼睛尖的同学说，在湖南社教时见过的省委领导张平化他们都来了。

就在这个会上，总书记邓小平做总结发言，讲了那句有名的“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在自己遇到很大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什么‘二月兵变’，根本没有这回事，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别人都调不动。至于‘二月兵变’，我正式地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部队到人大联系借房，不是搞兵变嘛！”邓小平总书记还对郭影秋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他说：“对郭影秋同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好的，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好的。”至此，“二月兵变”也不再成为一个话题。

以至于康生这个鬼，被迫在8月4日的北大集会上改口说：“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没有准备好。彭真要不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一副政治流氓的无耻嘴脸，一览无遗。康生是这几十年来中国政治舞台上最卑鄙、最恶劣的小人。为什么这样一个流氓能在政治舞台上猖狂至极，害人无数？笔者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就是从这所谓“二月兵变”开始的。我写的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用的是“小事件，大背景；小人物、大手笔”的写法，主人公都是些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大队书记、公社书记这些。个别有县团级的，已不是主要人物。书中唯一一个直接出现的写着真实姓名的大人物，那就是康生。

四

对郭影秋问题的争论，还扩展到了社会上。1965年的秋天，郭影秋带领63

级学生去京郊海淀区苏家坨公社参加社教运动。在那儿，不多的时间，郭影秋就给苏家坨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听说郭受到了冲击，苏家坨六百多名农民群众来到人大要保护郭影秋，甚至还贴出了“郭影秋万岁”“郭影秋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大字标语。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岁月，居然敢喊别人“万岁”，那可是大逆不道、杀头之罪啊！以至于毛泽东9月7日在他的最高指示中特地讲了这个事：“中国人民大学调动700多农民进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在这前后，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保证红卫兵运动毫无阻拦地向前展开，让红卫兵放手大干一场，曾多次要求各地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比如有：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8月29日《人民日报》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9月7日毛泽东关于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批语、9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不准挑动工农兵干预学生运动的决定”等等。

可是，在这样的强大压力之下，苏家坨的农民就是这样的纯朴、这样的勇敢、这样的无畏。他们并没有反学生。他们是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的好干部，拼着性命维护他们心中党的形象啊。我隔着马路，看着他们在校门外刷标语，心里是几多的酸楚。

8月20日晚，人民大学再次召开大辩论会。这时“二月兵变”已经不是话题。然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却已改变，邓小平被靠边，由上升到第四位的陶铸出面上台讲话。但他没有顺从极左势力的旨意，仍然直截了当地说：“郭影秋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因而招致了极左势力的怨恨。很快，当年年底，陶铸就被说成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把他和刘邓捆在了一起。打倒刘邓陶，被称为是“文革”的第二战役。至此，像邓小平、陶铸这样相对务实的领导也已无力挽狂澜于既倒。

五

这之后，“二月兵变”的风波虽然平息，但郭影秋的噩梦却是刚刚开始，他被残酷揪斗迫害长达数年之久。他在自己的“临终口述”中说道：“无休无止的斗争和打击持续了好几年，真是无休无止，批斗个没完没了。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

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打李培之也很厉害，她是王若飞同志的夫人，一个老年妇女，一伙人把她打倒了再拉起来，拉起来再打倒，如此折腾了几次，实在令人惨不忍睹。打我时，专打肋骨和后脊骨，一下把我打得眼冒金星，昏靠到墙上，突然，又来一拳，打在太阳穴上，当时就昏迷了。令我奇怪的是这些打手都很有打人的经验，似乎是有预谋的专门雇来的职业打手。如此毒打之后，又被拉出来游斗，那次我被打得无法走路，游斗中在地下躺了半天，醒来还认不清东西南北，找不到自己住的房子。”（请见：《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王俊义整理，《炎黄春秋》2002年第11期。说明：孙泱、胡锡奎、李培之也都是人大副校长。）

郭影秋后来好不容易保住一条命，活了下来，却被截去下肢，终身残疾。这就是为广大群众所景仰的优秀干部在左倾时期的遭遇。而孙泱、胡锡奎则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这在本书的后面都要专门讲到。在郭影秋曾经工做过的南京大学汉口路校区的北校园里，有座他的塑像。直至现在，每年清明前后，我都要过去看看，以表景仰之情。在一个不很起眼的角落，绿影婆娑之中，我凝视着我们的老校长、好书记。四周静静的，有白发的老人安详地领着儿孙，有年青的伴侣缓步细语，而我则沉浸在当年难忘的时光，回忆着所谓“二月兵变”的风波，久久不忍离去。■

作者现为南京审计学院教授，本文是由他的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中的一节改写。该书由漓江出版社2012年出版。在网上连载的题目是“我那左倾狂潮下的大学生涯”和“一个首都红卫兵的文革现场实录”。

【述往】

文革时就是应付怎么生存

王传纶

文革时生活颠倒了，谈不上什么系统的想法了，就是应付怎么能够生存的问题。那时我家三个人，一个孩子、两个大人，孩子毕业到了军垦农场，我就第一批上“五七”干校了。干校在江西鹰潭余江县的刘家农场。当时学校派去看地点的是原来的党委副书记崔耀先，他原来当过山西的一个地委书记，后在学校管党务工作，他到那去以后，就挑了余江县，余江县因血吸虫病而出名。他知道学校这些人也不会干活，得了血吸虫病很麻烦，所以就挑了一个坡地，下面有一点水，可以洗脸、洗澡。

那里的生活条件非常苦。最初去的一帮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盖房子，一部分管生产、管茶树、养猪、种地。我在基建队，基建队的主要成员是经济系的教员，我跟张腾霄(后来的党委书记)在一起劳动。我没有技术，也没有劳动技能。他虽然年纪比我大，但那时他体格比较好，又会劳动，他就带着我干活。我们两个合在一起做基建队最粗的活，就是把石灰跟沙子搅拌在一起，每天搅拌四五车，给基建队盖房子用。

“五七”干校的时候，劳动很苦。军宣队带我们去，就是认为我们这些人主要是去接受教育的，而越是困难的条件下，越能锻炼人，所以我们有时候白天没有太多劳动，晚上却要劳动。我们这些人年龄比较大，还有相当多的人戴眼镜，晚上劳动就比较困难。劳动完了以后也挺累的，也没人看书研究了。基本每人都有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就靠这个知道外面的消息。

这种情况到“林彪事件”传达以后就慢慢地松了。军宣队知道国内的政治情况要有一些变化，所以就不像以前那样抓得紧了。后来生活、劳动各半天，半天劳动完了以后，剩下的时间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好多人就千方百计地请假回北京了，然后想联系哪个单位了。北京的一些单位也觉得可以从我们那个地方找人，所以一批一批的人就陆续回来了。

当时我们在那里干了一两年以后，粮食够吃了，菜也多了，还有很多肉吃，生活就慢慢改善了。每个人都在考虑自己将来做什么，真的当一辈子农民？我想大家都没有这个想法。我觉得如果自己当农民的话，会是一个不合格的农民。当时想将来总是有一份可以做的工作吧，虽然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工作，可也不会强迫你做一些实际上不能做、也不会做的农活。

那时候还有一个“笑话”。经济系的项冲跟军宣队的人探讨，他说我们年纪

这么大了，将来做什么？军宣队的同志说将来总是有事情可以做的，比如图书馆看看柜台呀、传达室看看门呀。可问这个问题的人呢，他脑子想的就根本不是这样的。他跟我很熟。他患有神经官能症，还失眠。大家也了解他，就觉得他身体不好，不能劳动，就给他找一头牛放，就跟他讲他的任务就是管这头牛，每天拉着牛上山。可时间久了以后，他觉得老放牛也有问题，就吃安眠药自杀了。我听他们说他在自杀以前还想找我聊天。他原来是燕京的，年纪比我还大一点，是搞金融的，国民党时期曾在银行里工做过。

1972年回来的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没有了，那时就有一个前途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当初的副校长是郭影秋，他当时也是被打倒的，没有发言权了，可多少还有些影响。郭影秋有一个比较富有远见的打算，说中国人民大学既然没有了，这些人也不可能老留在中国人民大学，但中国人民大学聚起这样的队伍不容易，就成建制地调到别的学校去。所以我们经济各系就基本调到北京经济学院。经济学院原来是以劳动人口为主的，我们调去以后，就配备经济各系，基本上不打乱，不和他们合编。这个学校的学生很少，原来的教员都还在，而且也没有这样的系科，我们进去以后也没有什么事情。另外有一部分人到北师大了，清华、北大也都有一些，还有一些人在市委或调到其他单位去了。大体上不是太分散，基本上都在北京。

我到了中国银行。当时中国银行有一个调查研究处，叫第四处（现在叫国际金融研究所），“四人帮”打倒了以后，还是有些对外的经济关系。中美关系以及周边的一些关系恢复，有很多未了的事情要处理，像中美之间的资产冻结问题、汇率的问题。虽然那时对外的银行很少，可终究还是需要有个窗口。那时候我们国际金融的一部分教员就跟他们联系，大家以前就熟悉，彼此也信任，他们也欢迎我们去帮他们工作，因为不占他们的编制，也不要他们发工资。最初去的时候，有陶湘、林与投等人。去了以后就帮他们做一些业务上的事情，最简单的是翻译往来电报。后来因为中国银行要到处开展业务，就需要了解当地的情况。我先后做过拉美的金融市场、银行情况的分析，纽约市场、东京市场的分析工作也都做过，胡耀邦到中央党校管事的时候，提出利用外资的问题。我就参加了这个工作，就是把列宁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和苏联当时的情况整理成材料。当时还做了一些其他工作，像利用外资的问题、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外汇管理问题，还有主要国家的金融体系状况等等。

复校初期，基本上是后勤的人盖房子，还有些行政工作。因为还没有学生，像我们教员就没有什么实质的工作，就搞自己的，每个系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些准备。金融恰恰有这个便利条件，对方也需要，我们有一些人就到中国银行工作了。中国银行聘请我当研究员，实际上是希望我能够离开中国人民大学到中国银行，可是等到真正要调我的时候，学校又不同意了。我在银行一直工作到改革开放以后，后来学校的事情多了，我就彻底回来了。📖

【口述】

《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

冯其庸

本来社会已经走向“左”的险境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原定方针是纠“左”的，没有想到因彭德怀说了真话，不仅彭德怀被罢官，而且变本加厉地掀起了反击右倾的极左的运动，于是社会经济、政治再度走向“左”的险境。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在以上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当然更深层的原因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在文革爆发之初，学校领导接到一份中央调令，要调我到中央文革工作。校党委立即作出决定，同意调我到中央文革去工作，并由副校长孙泱带着校党委的决定来告诉我，动员我去报到。我与孙副校长关系较好，他原是朱总司令和秘书，是孙维世的哥哥，我与孙维世、金山也有过交往，加之孙校长为人朴实，所以我们比较投合。孙校长说，这场“文化大革命”谁也不清楚，学校生怕跟不上中央的形势，你去了中央文革，学校就不至于跟不上形势了，为学校着想还是去吧。我对孙校长说，什么叫“文化大革命”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怎么好去工作呢？何况我担任文学史和作品选两门课，一时都停下来，学生会有意见的。但当时是中央的调令，再加上党委的决定，我也不好坚决拒绝。所以我对孙校长说，让我缓一缓，等把课程安排好后再去报到，目前暂时不去。孙校长虽然觉得我讲得有道理，但还是说你尽快去报到。然后他就回西郊人大了。

我当时心里特别不踏实，实在不愿意去，所以就尽量拖延。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垮台了。不久前，《5·16通知》刚下来时，彭真还召集会议，请理论家和史学家到市委讨论《5·16通知》，同时也讨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被邀参加了这次讨论。我见到戚本禹也去了，这时大家都还不认识戚本禹，只知道他是史学家，比较“左”。其实他是江青的同伙，说不定这次到会上，是来摸底的，他在会上一句话也没有说。会议讨论得很热烈，一致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要求做学术辩论。其实这时连彭真都已被“四人帮”算计了，所以没有多久，彭真就垮台了。北京市委重新改组，由李雪峰任市委书记，人大校长郭影秋任文教书记。郭校长就把我找去，问我去不去中央文革，如果不去，愿不愿意与他一起去北京市委。他是副书记管文教，他要我去负责写社论。“文化大革命”中担任北京市委的文教书记，当然是在风口浪尖上，我去写社论，那等于是战场的最前沿。但我当时想北京市委比中央文革当然小多了，何况郭校长是我十分尊敬而信任的人，当时我的处境是不去北京市委就得去中央文革，我的打算是尽量往小的单位去，不要到中央文革去，所以我立刻选择了去北京市委。郭校长也很高兴，我也借此摆脱了中央文革。

我到北京市委后，第一篇社论就是《热烈欢呼中央的英明决定》。这是新市委向中央表态的一篇文章，当时写社论的有三个人，就这个题目各自写一篇，由市委挑选后呈报中央批准。我交上去的当天深夜，报社忽然来电话，说社论已经中央通过了，是选的我写的一篇，一字未改，中央还有许多好评，说这篇社论思想好、文笔好，因此通知我赶快到报社去看校样，接我的车已快到门口了。这样我连夜到了北京日报社，仔细校读了排印稿，然后就回家。第二天一早社论就出来了，当时市委内部一片好评，郭校长为此很高兴。

谁知高兴的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一周多的时间，这篇社论被江青、康生看到了，说是“右”的思想，加上新市委在其他问题上也跟不上“四人帮”的步伐，所以新市委成立不久，我被打倒了。新市委被告打倒后，文革的形势越发飞速发展，首都的高等院校以清华、北大为首，已经是闹翻天了，开始是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中国人民大学与北大、清华一样，造反派已经声势浩大，摩拳擦掌。我当时还在北京市委，我与郭校长商量，我还是先回学校，郭校长也同意我的意见，让我先回学校。哪知我刚回到学校，一夜之间，语文系便满

园贴出批判我的大字报，罪名是“中宣部阎王殿的黑线人物”“反动权威”，后来又上升到“刘少奇的黑线人物”等等。我当时还只是一名讲师，为了批判我，一夜之间，便把我提升到“学术权威”的位置上。但我心里很清楚，我的学术地位并不会一夜之间提高，只是一夜之间有些人找到了打倒我的借口而已。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在教学上一直挑重担，而且得到了学生的爱戴。还有我不断被中宣部、《文艺报》《戏剧报》借调出去写文章，早已使有些人感到不舒服了，“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正是最好的一个借口。所以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个以“反动学术权威”“黑线人物”的罪名被打倒挨批斗的，与我同时被打倒的还有胡华同志。

正在我被批斗的同时，有一天夜里，人大校团委内的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叫声：“郭影秋揪出来了！红卫兵都到广场上集合批斗郭影秋！”其声音凄厉而恐怖。我心想造反派马上要来抓我了，我如果躲开更加不好，不如挺身而出。果然刚想完，造反派就破门而入了（当时我已被关押在西郊语文系的宿舍里），把我押到广场的台上，站在郭校长旁边一起挨斗。

之后我的任务就接受系里红卫兵的批斗，同时还要在全校批斗郭校长时陪斗（并不是每次都陪）。记得系里第一次批斗我时，恰好是一个狂风大雨的下午，我的衣服已经全部湿透，台下的人衣服也湿了。他们宣布我所有的一百多篇文章都是“大毒草”，他们连毛主席称赞过的文章也忘记了。这时雨愈来愈大，我想这是天在哭，为全国所有被暴虐的知识分子痛哭，为中国文化遭受历史上空前的大破坏、大劫难而痛哭！漫天的滂沱大雨和宣判我所有的文章都是“大毒草”，却促成我写成了两首诗：

一

千古文章定有知，乌台今日已无诗。
何妨海角天涯去，看尽惊涛起落时。

二

漫天风雨读楚辞，正是众芳摇落时。
晚节莫嫌黄菊瘦，天南尚有故人思。

有一次批斗是因为我交给党组织一篇调查报告《回乡见闻》，这是三年困难时（1962年）我回家乡探望我母亲时的所见所闻，全是事实。我交给组织后还

得到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表扬，说我能向组织反映真实情况。因为我回家前，党内有过传达报告，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党员外出回来要向党组织反映社会真实情况，这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大批地区发生灾荒，饿死不少人。由于党的嘱咐，我回来时才会向组织报告。

我的报告里说，我亲眼看到我的老家无锡前洲镇冯巷饿死人的情况，亲耳听到了老百姓的议论。我还在报告末尾说明我的家乡是江南鱼米之乡，只要落实党的农村十六条政策，干部的作风廉洁，纠正浮夸风，纠正虚报产量等等，困难肯定是会克服的。这样一个报告，造反派却说我是反“三面红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我向全系作自我批判认罪。但我手头没有这份报告，我把原稿交给组织后自己没留底，我心里很清楚，我头脑里根本没有反党思想，哪里会写反党文章。土改时，我与我母亲是一户（当时我还未结婚），我分得一亩五分地，我母亲也分得一亩五分地，共三亩地。我从一个真正的农民，如今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教师（当时还未评职称，统称教师），我感激党还来不及，哪有可能去反党？所以我就向军宣队提出要看原报告，否则我无从检查。军宣队就将我的《回乡见闻》（为批判我而重印的）交给了我，我看到原文后，心里愈加明白和自信了。我就向造反派们提出来，要批判我，要我认罪，必须到我家去，将文章念给当地老百姓听，让他们来批判我，你们要以此批判我，这样不是批判得更彻底、规模更大吗？但我的意见他们不接受。实际上是他们不敢去，我家乡的老百姓如果知道我因反映了家乡的困难而遭到诬陷，被打成反革命，老百姓是不会饶过他们的。这时军宣队、工宣队看了我的文章，也都明白了，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所以这场批判也就不了了之。我因此而重新得到了这篇文章，至今还保存着。

文革中的另一件事是有一天夜里，我被学生接走了，当时家里的人都紧张得不得了，要我多带点粮票。我说不用，我一直爱护学生，学生不会把我怎么样，我就跟着学生走了。出了“铁一号”的大门就上卡车，我认识路径，他们的方向是向西郊学校去的，汽车开到半路，有一位学生在我耳边悄悄说：“别紧张，我们是来保护你的。因为知道对立派明天要来抓你，怕你遭灾，我们今天先来把你弄走，名义上只好说是去批斗你。”我听了也很感动，觉得学生还是好的。到了西郊人大，他们就把我藏了起来，对外只说被他们抓去批斗了。接着

就是学校两派不断的武斗。还死了三个学生。我大约被关了20多天，运动的趋势又转向了，他们就放我回去，说现阶段在没有事了，你回去吧。这样我又回到张自忠路住处。发展到后来，主要不是学生整我，而是语文系的造反派教师整我了。他们把我的日记抄走，加以篡改，并摘录重抄，说是我的反革命日记，要我签字承认。我对他们严加驳斥，我说我从未听说过日记是由别人记的，我对自己的日记每个字都负责。对你们抄的“我的日记”我一个字也不能负责。有一次一位教师拿着他们给我改的“我的家庭成分是商人”来通知我。我责问他们土改时我分到一亩五分地，这能是商人吗？他们无法回答。

在这一段时间里传来消息，老舍自杀了，陈笑雨自杀了，还有我的一位同班姓朱的老同学也自杀了（在无锡一个中学里），而且死得很惨。我听了非常伤心，后来我为老舍补题了一首诗：

哭老舍

沉江屈子为忧国，忍死马迁要著文。

日月江河同不废，千秋又哭舍予坟。

那一段时间，我的家被抄了多次，因为家里只有我大女儿和小女儿看家，我爱人在外语学院上班，家里无人管。抄家时我的多种《红楼梦》都被当作黄色小说抄走了，在西郊人大校园展览，我这才知道家里被抄，也十分担心这股把《红楼梦》当作黄色书抄毁的风一起，《红楼梦》要遭毁灭之灾。我就赶忙托人借来一部庚辰本《红楼梦》，每天深夜赶抄，抄了将近一年。刚好在1969年下放前抄完，所以我现在还留有一部我自己抄的庚辰本《红楼梦》。

1970年，人大被下放江西余江。火车刚到刘家站时，正值滂沱大雨，却通知不要下车，直奔南昌，参加挖修八一湖的劳动。于是我们就直接到了南昌，参加了挖八一湖湖泥的劳动。我负责拉车，当湖泥装满一车（木板带框的车）时，我即负责拉走。这是一项极重的劳动，那时我虚岁47岁，身体还好，加上我在家乡种过十多年地，干过许多重活，所以还能顶住。在南昌挖湖泥约有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到了余江农村。我们的村子记得叫李下基，住的都是营房式的房子，任务是开山、打石头，使之成为建筑材料；另外就是种茶、采茶，再有到春天农忙季节就是种水稻。这几种活我都很快就学会了。打石头时，我

不小心被铁锤打坏了左手大拇指，情况很严重，幸亏医务处的同志很同情我，使劲给我打青霉素，居然没有感染溃烂。种水稻我是内行，学校里大都是北方人，不会种水稻。所以我还帮着教他们拔秧、插秧等。每到早春采茶季节，就是天天采茶忙，我的任务是挑茶叶。茶叶很娇贵，采下来的茶叶不能着地，一着地就会沾泥土味，所以必须一肩直挑到茶场晾茶处，我因为早年在家乡挑过重担，能挑100多斤，不需要停下休息，可以转换着两肩直挑到茶场。这样我又成了专职的挑夫。

但是，在干校，并不是光劳动，还接受定期的批判，做检查。记得一位同志因为晾晒《红楼梦》而引起了一场批判。就我所知，干校先后还死了三位教师，两位是因为江西天气太热，学游泳淹死的，一位是因受冤气愤不过，开木工房的电锯自杀的。这三位都是与我们在一起的。我那时与别人不一样，我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一场历史的浩劫，我们赶上了这个历史劫难，除了接受外，无处可躲避，除非是死。但我又觉得不值得去死，这要感谢司马迁，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因为不能忍受眼前的冤屈而死，我觉得太不值得了。我无锡国专的同班同学好友朱君用剪刀自杀的消息传来，我几乎为之痛哭失声，他是精熟历史的历史教员，但却不能从历史中取得鉴戒，我哭他的诗说：

哭同班好友朱君

哭君归去太匆匆，未必阮郎已路穷。

绝世聪明千载恨，泰山一掷等轻鸿。

末句是既伤心痛惜他，又责备他不应该泰山一掷。所以我当时自己发誓，并嘱咐家里人：我决不自杀，除非被打死。纵然被打死，也是屈死而不是该死，所以我的心态是一定要把这场运动看到底，看它个水落石出，就像我第一首诗说的“看尽惊涛起落时”。

终于我在干校时就看到了林彪折戟沉沙的结果，当时我心里暗暗地想我也会看到江青的下场的。我的诗友江辛眉在文革中有一首诗，诗中有一句话说：“江草衰青卧夕阳”。他偷偷给我看时，我微笑点头，心照不宣。所以当时虽然条件艰苦，命运未卜，但我却一直想着将来，我坚信有将来。我下干校时，除抄成

《红楼梦》外，还买了不少书。当时不少老教授纷纷把书卖了，我非但不卖，还去把别人的书买回来。我把全部书钉成九个大箱，我说如果真的战争了，那也是天意，但我坚信我会回来的，我仍要用这些书的。所以文革中除抄家丢失一部分书外，我还买进了不少书。在干校我也是这个心态，当我听到林彪摔死的消息时，我愈觉我内心所预测的或许真要应验了。

三年干校生活，我利用假日两上庐山、湖口、彭泽、东林寺，寻陶渊明、慧远、陆静修的足迹。在星子找到了黄山谷题词的落星寺遗址和周瑜练水军处。用它与史实对勘。我还跑到铅山，想找辛弃疾的坟墓，没有想到虎头门离铅山还有数十里之遥，我只得无功而返。我还在除夕到了桂林，然后又到阳朔，在阳朔坐小船溯流而上，经九马画山，一路风光如画，我心里默默记着将来要把这些山水收入我的笔端。我还利用探亲假到了雁荡山，在永嘉看到了江心寺，想到了近代诗人施叔范《过永嘉江心寺哭文天祥》的名诗。我到了雁荡山谢公岭，遥想六朝诗人谢灵运的风致。还到了大小龙湫，从而领会了徐霞客对大龙湫的一段特殊的描写。我还利用回北京的机会到了黄山，那时整个黄山没有一个游人，我独自登山，在玉屏楼住宿。因为我到天都峰下时，已是夕阳残照，我趁此将没的天光，奋勇独自登上了天都峰顶，正是独立苍茫，满目残阳。我又赶忙下来，再穿一线天上玉屏楼，过一线天时天已漆黑，我是摸着石壁通过的，到玉屏楼已经掌灯，所以服务员说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敢黑夜登山。那次我跑遍了黄山全山，还意外地找到了石涛当年的古汤池。池很完好，但已被改作仓库。我是碰上他们开仓库取东西，从窗户里看到石壁上四面的题字，进去细看，才发现就是石涛所画过的古汤池。池原在路边，现仓库也仍在路边。画中提到的祥符寺，就在旁边，已被改为办公室。但用原地址一对，这几处古迹便可互相对证，确凿无疑了。我还从“人字瀑”中间找到了徐霞客当年登山的古道，因徐霞客书中记到他是从“人字瀑”登山的，至今古代的石级还依然存在，可以确证。我还利用回京的机会，登了泰山，直上岱顶，看到了秦始皇立的无字碑，还有浚阳张铨的题诗碑，诗曰：“莽荡天风万里吹，玉函金检至今疑。袖携五色如椽笔，来补秦皇无字碑。”诗极有气势，令人不忘。我还看了曲阜的孔庙和孔陵，此时造反派破坏孔庙孔陵的罪证历历在目，依然可见。我在孔庙的东庑看了久已神仰的《五凤刻石》和《孔宙碑》《孔宙碑》文革中也遭到了破

坏，被凿坏了若干字。在邹县孟庙，我看了名刻《莱子侯刻石》，还看了文徵明手植紫槐，已是满地龙蛇，成为奇景了。

三年的干校生活，是我重干苦力劳动的生活，也是我仍在文革中接受批斗的生活，我在人身上和精神上都还未得解放，但是三年干校生活我还是有收获的：一是我好不容易有三年的时间回归自然，朝夕与山水田园相接触，如果没有隔一段时间的批判，几乎是陶渊明般的生活了，何况我们离陶渊明的栗里、彭泽也不算太远，我还到庐山的南栗里去调查过陶渊明故居遗址，到东林寺走过虎溪三笑的遗迹虎溪桥；二是我学会了几种新的劳动本领，如开山打石头、采茶等，这是我以前在家乡劳动所没有的；三是结合我读书调查的癖好，我游览并调查了不少名山大川和文化遗存，大大扩展了我的眼界和胸襟，这对我以后的读书、研究和书画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当我离开干校时，还写了一首诗，隔了几年我再到江西时，还曾去干校探望，却已经是物是人非了。那首诗为：

干校即事

三年从事到江西，手植新桐与屋齐。
门外青山对图画，屋前流水入梅溪。
西崦日落锦为幔，东谷云生玉作猊。
最是村南行不足，红樱花映白沙堤。

五

我是1972年从干校回到北京的。回来后，到1973年6月，就给我落实政策，文革中加给我的罪名统统取消。但我被抄走的全部日记却一本也没有还我，原因是他们在我的日记上篡改了很多，作为我的反革命罪证，无法还我，所以由总支书记出面说已丢了，无法找回了，希望我不要计较。事实上我当时要计较也无从计较了。但由于这许多日记的丢失，有不少我的往事，我负债、还债的事，我的诗词作品（诗词常写在日记上），还有我与许多学术前辈的交往，就统统无从查考了。

我们刚去干校时，“四人帮”原想把人大留在江西不让再回来了，据说当时江西省委书记程世清嫌人大老干部多，工资太高，对他来说是一个大包袱，所以没有接受。最后人大仍回北京了。这虽是我的耳闻，但回来不久，“四人帮”

就宣布人大解散，这说明“四人帮”确是要取消人大的。

“四人帮”为什么要解散中国人民大学呢？许多人都不明白。其实当时人大的教师大都是清楚的。我认为根本原因就是人大有一批老教授，老干部是从延安来的，都很了解江青的底细，江青就怕有人揭她的底。文革中，人大语文系的黄晋凯同志无意中从资料室所藏30年代上海的报刊上发现了江青当时的情况，因而被造反派狠批。当时“铁一号”传达室的一位老同志是长征干部，因为没有文化，在人大传达室工作，他就多次骂过江青，说她不是好东西。这是我亲自听到过的。所以人大的存在对“四人帮”是一个障碍，让江青夜不安席。还有曲艺协会的领导陶钝同志，是山东诸城人。与康生、江青都是老乡而且很熟。江青的母亲去世后，还是陶钝帮她料理的。但文革中，在江青的授意下，陶钝首先被打倒了。“四人帮”垮台后，文化部组织一批老干部去参观山西大寨，其中有曲协的陶钝同志，舞协的胡晓邦同志，我也一起去参观了，这是陶钝同志亲口给我讲的。所以江青最忌讳的是别人知道她过去不光彩的经历，凡是知道她的底细的人，都会遭到她的迫害。中国人民大学在“四人帮”的统治下，当然不可能有好命运。■

【口述】

张林南：我的成长史（口述节录）

张林南

1964年8月，我收到人民大学入学通知书，录取我为“人大”国际政治系的学生。入学后不久就“下连当兵”，有一位和我编在一个班的同学告诉我，她第一志愿报的是国际政治系，却被分到了党史系，我俩一通气可高兴了，我俩可以换系了，都可以上自己喜欢的系了。入学教育结束，我俩去找分管教务的副校长，要求换系。副校长把我俩批评了一顿，说我们“无组织无纪律”，我俩灰溜溜地走了。过了一段时间，那位副校长将我找去，他说：“我和你父母亲一起工做过，你考‘人大’我知道，你考得不理想，是你们学校把你推荐来的，学校介绍了你的情况，说你写了入党申请书，政治热情高。为什么把你分到国际政治系？因为你政治上可靠，家庭出身好，这个系的人将来是要外派的。那

位同学有海外关系（注：她父亲是北大教授、印尼华侨），因此不能上国际政治系。”我听了副校长的讲话，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一方面下决心好好学习，不辜负党的培养和期望，另一方面我也为那位同学感到不平。我们高中班有10个同学没有考上大学，绝大多数不是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而是因为“出身不好”未被录取，我也为她们感到不公平。

“人大”国际政治系一共有五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专业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我们班35个人，两个女生，有5个干部子弟，其他大多数是工农子弟，一半以上是原来中学里的团支部书记。第一学期的班干部是指定的，我当团支部委员。入学第一天，每人发一个小马扎，一个部队用的小针线包，一个班一套修鞋工具、一套理发工具。学校要求我们保持和发扬“人大”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入学教育一是劳动——拔校园里的草；二是看《早春二月》《以革命的名义》等电影，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树立阶级斗争观念，立志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三是端正学习目的，每个人都要讲讲自己为什么考“人大”。有的同学说为了将来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展马克思主义，有的想当外交官，有的想到《红旗杂志》社工作，还有一个同学说上了“人大”可以看《参考消息》……。大家敞开思想，讲得既率直又天真。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的入学动机很单纯，就是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10天后，就让我们“下连当兵”，到昌平第三工程兵学校锻炼一个月。我们除操练外，还学习了摆地雷阵等军事技术，大家感觉很新鲜，很高兴。

大学一年级主要学基础理论，如党史和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发了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没有讲。我们班里的学术空气很浓，大家都能敞开思想，自由发表意见。在一次哲学课的讨论会上，班长发言说：“世界的万事万物都能一分为二，那对毛主席能不能一分为二呢？我认为能！毛主席很伟大，但是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所以也应该一分为二。”团支部书记说：“对毛主席怎么能一分为二呢？我认为不能，毛主席和马恩列斯并列，是绝对正确的！”老师没有批评班长，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班上少数人同意班长的意见，多数同意团支部书记的意见，我认为双方的观点都有道理，从普遍意义说，对毛主席也能一分为二，但从感情上讲，毛主席一贯正确，不容怀疑。还有一场辩论会，那次是学习讨论周扬在哲学社会科学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在

掀起反修防修运动的背景下，周扬说：“我们需要培养出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当时社会上正在兴起学雷锋的高潮，会上有人提出，我们应该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做雷锋式的人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雷锋式的人物哪一个对社会的贡献大？以班长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重要，雷锋只是普通的人，我们的目标应当使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我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雷锋是革命的螺丝钉，放在哪里都能用，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让他学理论，他也能成为理论家。我们要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要向雷锋学习，做雷锋式的人物。我崇拜英雄，雷锋、焦裕禄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我的楷模。

我很热爱我的班集体，真诚地对待每一个同学，常常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牢记毛主席干部子弟不能脱离群众的教导，虚心地向工农子弟学习，和他们交朋友，我和大家的关系非常好。有的同学们说我是“活雷锋”“比金子还纯洁”。上大学时妈妈给我买的“基洛夫”手表成了大家的共同财产，同学们轮流戴。一年级放暑假，班里有些同学因为没钱买火车票回不了家，我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回家后，我和妈妈商量，请妈妈帮助这些同学，让他们能够和家人团聚。妈妈给了我200元钱，我分给了这些同学，大家高高兴兴地回家了。1965年8月5日，在大学一年级暑假，我入了党。

文革前夕，1965年，学校组织我们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在班里的讨论会上，团支部书记将矛头直指班长，他说班长“学术走错了方向”“怀疑毛主席，认为毛主席也可以一分为二，这是怀疑一切”，还说班长“反对学雷锋”等等，班长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他们俩从此分道扬镳。我看出支部书记是有意拉班上的人整班长，我不同意他这样做，我认为班长是一个好人，他并不反对毛主席，我很同情他，会上我不发言。班长被批判之后，不大和别人说话了，但是，他经常来找我讲讲心里话。他看了许多马列的原著，还指导我看一些书，我知道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我很佩服班长对科学的执着精神。在我们那个年代里，能做到像班长那样是很不容易的。

1966年6月，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后，我们学校的同学们都去“北大”看大字报。回来后，大家开始给校党委和系里领导写大字报。当时，我是我们班文革小组的组长。我没有看出校党委有什么问题，所以没有写大字报。

对别人贴出来的大字报，我一篇篇认真地看，发现有的大字报有不实之处，感到很生气，心想都是搞政治的，怎么能胡说八道，不负责任呢？有一次，我看到系里老师写的一篇批判系党总支的大字报，里面有无中生有的东西，我就去找他们，当着这些老师的面说：“你们是教马列主义的老师，怎么能不实事求是呢？那个会我参加了，我怎么没有听到你们批判的这些话？”他们无言以对。

我们班的一些同学，在团支部书记的带动下，把矛头指向了我们系的党总支专职书记（女）。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入学时，老师说：“你们毕业时将全部是党员。”但是，入党有先有后，没能在文革前入党的个别人就不满意，对总支书记有意见；有的同学是因为挨了批评，心里不满；而团支部书记认为他没有当选我们系一、二年级的党支部书记也是因为党总支书记的原因，于是，团支部书记就领着这些人把矛头指向党总支书记，写出一些不符合事实的大字报，他们让总支书记站在桌子上接受批斗，甚至做出揪头发的粗暴举动，还企图砸存放档案的保险柜。我坚决反对他们这样的行为，劝他们说：“你们完全可以给校党委和系总支的领导写大字报，但是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抱着对他们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提意见，而不能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泄私愤，图报复。”他们嘴上没有反驳我，心里对我肯定非常不满。

大概是7月底或8月初，党史系的几个干部子弟来找我，说他们要成立一个组织——“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希望我们系的干部子弟也参加。我很反感他们这种脱离群众的做法。为此，我和系里另外两个干部子弟给中央文革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干部子弟脱离工农子弟，成立自己的组织的不满，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纠正这种倾向。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几天后，以我们系四年级工农子弟为核心，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参加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们学校的这两个红卫兵组织都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在对待郭影秋（人民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文革初期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态度上却截然相反。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郭影秋的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保郭影秋。我是坚决保郭校长的，因为他在人大广大师生员工中的口碑很好，他工作作风深入，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对处理中国人民大学由于历史原因不团结的问题提出了“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正确方针，他对教

育改革有许多新思路……。

8月份，学校里贴出了第一张反郭影秋的大字报《揪出人大牛鬼蛇神的总后台——郭影秋》，题目每一个字占一张大字报纸，内容空洞无物，但用词尖刻，说郭校长提出的“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方针是阶级斗争熄灭论；郭影秋在“四清”中（郭是人大四清工作队总负责人）保护了牛鬼蛇神、走资派等等。我正好看到和我一个党支部的我们系一年级的一个党员带着几个人在贴这张大字报，当场质问他：“你凭什么写这样的大字报？你的材料呢？是谁让你写的？”他说：“是党史系的某某老师让我们写的，他们有材料。”这张大字报在全校引起巨大轰动。我对这种乱扣帽子的所谓造反行为非常反感，我认为在背后指使学生的老师动机不纯。这时，“四清”回来的我校师生纷纷写大字报保郭影秋，讲了许多郭校长在“四清”中的感人事迹。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和班里几个同学决定去“四清”点上做调查研究。当时还不太会骑车的我借了一辆破旧的28男车，一路跌了数不清的跟斗，行程60多里，终于到了“四清”点苏家坨，在那里住了几天，走家串户地调查，得出了我们自己的结论：“郭影秋不仅不是牛鬼蛇神的总后台，不是走资派，而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回到学校后，我们几个人写了一张保郭影秋的大字报，我签了名。

大概是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我们学校的大操场上召开了一次大型辩论会，陶铸主持大会，邓小平等中央首长也来参加，辩论郭影秋到底是什么样的干部，两派一对一地发言。那天辩论非常激烈，反郭派说郭影秋是四类干部，一无是处；保郭派说郭影秋是一类干部，这样好的干部少有。会前，保郭影秋的不知什么人把开辩论会的消息传到了苏家坨，结果当天苏家坨来了500农民参加辩论会。这场辩论会以后，毛主席在一个批示上说，郭影秋调500农民进城来保他。后来郭影秋就被打倒了。我们这些“铁杆保郭派”不甘心，曾冒着大雨到国务院信访局反映情况，说明不是郭影秋调农民来保自己，说郭影秋的确是好干部，为郭校长鸣不平。

1966年9月，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领导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大操场接见红卫兵，要求北京的红卫兵到各地去串联，将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传播到全国各各地去。当时把外出串联的红卫兵组织了四个大队，我和我们系的十几个人作为第四大队第三中队的成员前往广州，我们之中大多数是学生干部和党员。广东

省委对我们这些从北京“派来”的红卫兵很重视，安排我们住进省委招待所。我们在省委看大字报，到广州的大学里面跑，参加一些学生和群众的集会。还在公共汽车上读毛主席语录，宣传“十六条”。不久，在省委机关礼堂召开了省委的干部大会，让我们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我也作为代表之一上台发了言，讲了文革在北京、在大学里是怎么搞起来的，毛主席对文革如何亲自指导，寄予怎样的期望。并针对我们看到的广州的情况，强调“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呼吁大家一定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天晚上，赵紫阳、林里明、欧梦觉等省委领导接见了我们，并与我们座谈。记得我和赵紫阳还辩论起来，他说：“我们广东省是祖国的前沿，面对香港和台湾，一定不能乱，不能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我说：“我们认为广州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人们缺少革命热情，都很温良恭俭让！”想想我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回家后和母亲讲起这件事，被我母亲批评了一顿，说我太偏激。

10月中旬，我们从广州北上，先去了湖南韶山，瞻仰了毛主席的故居，又到了南昌，参观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然后坐汽车上井冈山，边参观革命圣地，边重温党史。下山时，汽车开到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井冈山分校时坏了，我们都下了车。学生们知道了我们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后，要求我们讲讲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们讲了以后，学生们感到很新鲜，激发了他们投入文革的热情，他们纷纷要求到北京和全国去串联，学校的秩序乱了起来，引起了吉安地委的不安。地委派人来调查我们的来路，说我们把学校搞乱了，把我们扣住不让走了。我们在井冈山分校住了好几天，和学生们的关系搞得非常好。地委放我们走时，学生们送我们每人一双自己编的草鞋，还有竹子做的扁担、水桶、笔筒，还送了一个他们自己种的40多斤重的大南瓜。我们回到北京后，把这些礼物毫无保留地捐献给设在北京展览馆的红卫兵战果展览了。

1966年11月初我们回到学校时，学校里的人还不多，都在外面串联，所以，我们又组织了一次步行串联。这次我们经过了周密的策划，步行串联的宗旨是：重走长征路，一路搞社会调查，从事革命实践，通过实践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史，自己教育自己。路线是从北京一直走到瑞金，再从瑞金开始沿

着长征路线走，到达延安，最后走向北京。“长征队”人员22人，其中我们系的人最多，还有党史系、哲学系、农经系的6个同学，另外吸收了两个“人大附中”的初中生和两名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的同学，年龄从14岁到28岁，党员占了一半之多。为了走完“长征”的艰苦历程，根据毛主席“支部建在连上”的指示，我们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选举了书记、副书记和长征队队长，我当卫生员，负责背药箱。我们背着行李、毛选和油印机、纸张，还有一套《收租院》的图片，平均每人负重30斤。我们还特制了一面写有“长征大学”的红旗。出发那天，先坐车到天安门广场，这是我们长征的起点，大家一起照了相，然后，就举着大旗出发了。

第一天我们走了七、八十里，到白洋淀住了下来，这里是抗日战争中让日本鬼子丧胆的大片芦苇荡。我们请参加抗日的老乡给我们讲抗日的历史……。第十天，我们到了饶阳县五公村，这是冀中平原首先搞合作化的村子。解放战争时期，耿长锁和徐树宽夫妇率先办起了互助组，以这个互助组为核心，办起了冀中平原上的第一个合作社。我们走家串户，了解历史，搞社会调查。来这里的中学生多，大学生少，而大学文科生我们是第一批。耿长锁提出一个请求，让我们帮助他们办一个展览，不然来参观的红卫兵太多，他们老得讲，耽误生产。我们答应了，开始办“五公村村史展览”。我们早上五点半起床，半天劳动，另外半天一部分人收集材料，办展览，一部分人在周围的几个村子里搞社会调查。

1966年12月，党中央发布了农村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政策，我们的社会调查又扩大了几个点，扩展到深县。每天早上我们分工，有和社员一起劳动的，有到各个点上搞调研的，晚上开碰头会，交流情况，写调查报告。在深县的一个村子里，我们看见这里一些农民特别穷，住的房子类似猪圈，床上就一张草席子，连被子都没有。而有的房子非常好，有门楼，还有二层楼的，住好房子的都是干部，群众对大队干部很不满，认为他们多吃多占。我们明白了毛主席为什么要搞“四清”了。我们每走一户，送一张毛主席像，有的老乡称我们为“青天”。

不久，天津大学来了一批红卫兵，说他们是来贯彻农村文化大革命十条的。他们横冲直撞，蛮干，把耿长锁夫妇打成了走资派，把我们打成保皇派，说我

们右倾。我们说：“你们要做调查研究，不能下车伊始，哇里哇啦！”村里一些人受了他们的影响，想批判我们，但是没有成主流。他们的到来，完全打乱了五公村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我们对他们非常反感。

1967年2月，中央文革发出通知，要求结束大串联，回校复课闹革命。尽管我们的宏伟计划没有完成，但是我们在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三个月，各方面的收获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对我们没有机会参加“四清”的人，接触和了解了农村的一些情况。我们写了调查报告，回北京后递交给国务院信访局。

回到学校后，两派斗争升级，闹得很厉害。保郭影秋的一派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核心组织了“新人大”，全校70%以上的学生、老师，90%的党员、干部和99%以上的工人参加了“新人大”，是多数派；反郭影秋的一派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核心组织了“人大三红”，是少数派。后者尽管人少，能量不小，自封为人大的造反派，视“新人大”为保守派。“人大三红”抄了郭影秋的家，想办一个展览，结果什么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也没有抄出来，抽屉里翻出不少三年困难时期补助他的副食品票，他都没有用。他们自己说：“这只能是一个呈现郭影秋艰苦朴素的展览。”办了没几天就撤了。“新人大”将副校长孙泱打成走资派，把他关在图书馆楼的一个屋子里，有一天发现他“自杀”了。“人大三红”占领了教学大楼，“新人大”占领了图书馆大楼，各有各的广播，互相对骂，“人大三红”的开始曲是《解放台湾》，“新人大”的开始曲是《解放南方》。

这时，我的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父亲被打成了叛徒，我成了“狗崽子”。

还是在五公村时，天津大学的红卫兵带来了一条消息，他们说，查解放前的旧报纸，发现他们的校长高仰云是叛徒，他是在自首书上签了字出狱的，而且不是高仰云一个人，是一批，薄一波是其中之一。我听了以后，心里咯噔一下，我想到了我父亲。我听父亲讲过他坐牢的事情，他还带我们去北京草岚子监狱旧址，他说：“我当年就是在这里住了四年监狱。在狱中，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和敌人进行各种斗争，还坚持锻炼身体，决心‘红旗出狱’。”我父亲还保存了一张狱中难友戴着脚镣做操的照片。我也听说过，他们是“组织营救出狱”和“用特殊手段出狱”这样的话。大概是1967年3月，毛主席在批阅农业部报送的廖鲁言的材料上批示：此次运动揪出了一批叛徒……。从此全国掀起

了抓叛徒的高潮。以后就把1936年经北方局营救、党中央批准的经过特殊方式出狱的这些人定为“61人叛徒集团”成员。

从五公村回学校后，有一次去食堂吃饭时，在食堂门口发现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大叛徒WCZ的爱女王太行，为了保她的叛徒老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打击、压制革命群众造反！……王太行是刘少奇的‘黑修养’培养出来的修正主义黑苗子……”我一进食堂，就有人喊：“打倒大叛徒WCZ！”我心里很沉重。回家问母亲：“我爸爸到底是不是叛徒？”我妈妈毫不犹豫地说：“你爸爸不是叛徒。他被叛徒出卖，关进邢台监狱，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他至死不供。你爷爷奶奶花钱去赎他，他坚决不出狱，说：‘不能红旗出狱，就把牢底坐穿！’他当时只是共青团的总支书记，却被敌人当作共产党的要犯押解到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他在监狱党组织领导下坚持对敌斗争，曾绝食七天七夜，和薄一波等12位难友被判了死刑，戴重镣，因国民党驻军和张学良的部队换防，死刑才未执行。他是在狱中由团转党的。他入狱和出狱的情况从来没有向组织上隐瞒，我相信你爸爸不是叛徒。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总会搞清楚的。”我父亲的老秘书刘叔叔也对我说：“你爸爸绝不是叛徒！”我从内心相信我母亲和刘叔叔的话是真实的，我不相信我父亲会是叛徒，但是，毛主席、党中央给他们61个人定了性，而我又是坚信毛主席和党的，他们毕竟是在自首书上签了字啊！所以，我感到很困惑，底气不足。我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怎么说，父亲的事可以先放在一边，我要响应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又想到在深县农村调查时干部欺压老百姓的例子，说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还是必要的、及时的。所以，我努力说服自己，不受父亲被打成叛徒的影响，继续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自觉在革命实践中经受考验。我的观点倾向“新人大”，也跟他们在一起活动，但由于父亲的“问题”，当时并未从组织上批准我加入“新人大”。

1967年3月3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到我们学校做报告，促两派大联合，要求两派坐在一起整风，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学校开始“三·三整风”。在我们班的整风会上，我主动检讨自己思想右倾，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把人都往好处想，因此压制了群众造反的积极性，起到了阻碍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作用，

我诚恳地希望同学们帮我提高认识。我的检查还没做完，一个同学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王太行，你不要避重就轻！最使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是你叛徒老子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做检查？！”我愣住了，血一下子涌上了头，我也本能地一拍桌子站起来说：“XXX，我告诉你，我没有一顿吃不下饭，也没有一天睡不着觉，我天天高高兴兴地跟着党和毛主席干革命，你别想诬蔑我！”那个带头造系党总支专职书记反的团支部书记（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声色俱厉地对我说：“要是在战场上，我一枪毙了你！现在我勒令你摘下红卫兵袖章！你有什么资格当红卫兵？”我马上答：“我是父母所生，但我更是党的孩子，是根据地的老乡给我的性命！我对党的感情比对父母的感情还深，你想拆散我和党的感情，想让我摘下红卫兵袖章，从此不革命，没门！”更恶劣的是，他拿出20元钱——就是一年级暑假我妈妈给同学们的路费钱，说：“这是我借你的钱，现在还你！”我说：“去你的吧，我才不要你的臭钱呢！”就连长征队也有人批判我右倾，说我应当和叛徒父亲划清界限。还有的人说我学雷锋、学英雄都是假的……。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人以前说我是“活雷锋”“比金子还纯洁”，仅仅一天之隔，知道我爸爸有问题了，就翻脸不认人，想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通过批判我，和我划清界限来显示自己革命。我感到不是他们不了解我，而是他们的灵魂中有肮脏的东西。这场大革命的确容易暴露人们的灵魂，让我看到真实的世界和人情冷暖。我认为这完全不是整风而是整人，毫无团结与联合的诚意，因此十分气愤，当即决定不再参加这样的“整风”，我推开门就走了。

正是在1967年3月，河北沧州地区发生地震，我和班里一起“长征”的两个同学、我小弟弟，还有别的班的两、三个女同学一起去沧州抗震救灾。没有人组织我们去救灾，完全是自愿的行动。

从灾区回来后，形势急转直下，在康生的指使下，我父亲的骨灰从八宝山骨灰堂一室被清理出来。系里的造反派抄了我的东西，从我箱子里把好朋友CH的日记也给抄走了。我又生气又委屈，回家后，找出我从初中以来的日记——记录了我8年、2900多天的生活、学习、思想，我青少年时代的点点滴滴——全部烧掉了，一边烧，一边哭，心里埋怨我父亲，“你为什么要在自首书上签字呢？现在说不清楚了，让我连干革命资格都没有了……”我把我保存的几张爸爸的相片也烧掉了。当时，我的思想很矛盾，既不相信父亲是叛徒，又不敢

怀疑毛主席和中央的结论是错的。因为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无限热爱党、忠于党，党和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胜过自己的生命！我大学一年级做扁桃体手术的时候，忍住剧痛的动力是来自想到江姐在敌人酷刑下宁死不屈。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像《红岩》中那些先烈一样，被敌人逮捕了，会不会投敌叛变？我坚信不会，我会像先烈们一样视死如归！同时，我也记得，当看到焦裕禄的报道时，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惊奇，因为从我看到的、从母亲和叔叔阿姨们那里听到的我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人。这样一心为公的人难道会贪生怕死、叛变革命吗？！我困惑和矛盾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我最终的选择是：如果父亲确实是自首分子，就和他划清界限，继续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但我期待着中央还有与之不同的结论。可以这样说，在文革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当党和毛主席的决策与我的朴素认识和个人亲情相对立时，我采取的态度是，努力改造自己，压制内在的本性，宁可舍弃亲情，也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服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也是在1967年3月，我的姥姥去世了。姥姥在解放战争后期，便从老家出来跟随我父母，照顾我和1946年底出生的弟弟。她患了肠癌，送哪个医院都不收。当时，因为杨尚昆被打倒，中央办公厅被全锅端出了中南海，集中在北京郊区办学习班。母亲进了学习班，两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因为我父亲被打成了叛徒，家里的暖气被停了，屋里冷得像冰窖，姥姥躺在床上疼的昼夜呼喊我母亲的名字，可家里连一片止痛药也找不着，串联回来的我守在姥姥身边，只会掉泪，束手无策。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在痛苦中无助地垂死挣扎，我的心也痛苦到了极点。姥姥叫了100天，终于停止了呼吸，我亲眼看到她死不瞑目。

北京高校的武斗愈演愈烈，我们学校是用长矛捅死了人，听说清华等高校用真枪实弹也打死了人……。各高校已经处于完全无政府状态，谁也控制不了了。1968年7月，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入高校。宣传队的任务是制止武斗，整风、整党，搞大联合。我大弟弟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学生，他和我都是1965年8月入党。当时，“清华”“北大”是样板单位，整党先行一步，我弟弟整党时转了正。我问他是怎么过关的？他把整党时写的材料给我看，讲的许多是违心的话。他说：“不违心怎么办，中央已经给爸爸定了性！”我也借鉴弟弟的材料在整党中做了检查，说：开始对文革不理解，思想右倾，对老师和同学的造反行动有压制；后来父亲出事了，认为同学们对我的批判很不公平，感到

很委屈：现在中央给刘少奇和“61人叛徒集团”定了性，我也应该和父亲划清界限了，我是党的孩子，今后要紧跟党和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等等。工、军宣队对我很好，他们认为我本质不错，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还算比较顺利地转为正式党员。

按正常学制，我们班应当1969年7月毕业，但在文革的特殊年代，我们依然待在学校里。人民大学从来没有复课，同学们在学校挖战备防空洞，去农村（苏家坨）整党，很多同学参加了北京修建地铁和建“东方红炼油厂”的劳动，我们班大部分同学则去了卢沟桥张百发的建筑工地干活。我整整当了半年灰土工，天天铲石头，有时还背水泥，往搅拌机里送，虽然感到腰酸背疼，早晨起来手肿得攥不住拳头，但能够锻炼自己吃苦耐劳的本领和学到一些生产技能，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如今我们已经携手走过了大半生。我们是同班同学，他是我大学一年级赞助同学回家路费的人之一，他从家里回来后，主动还借我的钱，我坚决不要，他就买了一套《列宁选集》送给了我。文革前我们不在一个学习组，很少来往。文革中，我俩观点一致，都是保守派。无论是串联还是“长征”，抑或是去地震灾区救灾，他都和我在一起，渐渐熟悉、相知。在我父亲被打成“叛徒”后，班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还像过去那样热情诚恳地对待我，他是其中之一。虽然同岁，他却像大哥哥一样处处爱护我，保护我，使我很感动，因此很自然地由志同道合的朋友发展为恋人的关系。SM的父亲是一名大连造船厂的老工人，母亲是家庭妇女，为了供他上大学，妹妹中断了学业去街道小厂参加工作，妈妈给人家看两个孩子。1968年6月我和系里两个同学及我小妹妹曾与他一起去大连，挤住在他家，天天到大海里游泳。SM家虽然条件很差，睡的是大炕和木板临时搭建的床，用的是煤油灯，有一间屋还漏雨，但他母亲总是想尽办法给我们变着花样做好吃的，他父亲和妹妹也热情相待，我们彼此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想不到几个月后，我们班一个同学到大连出差时顺便去他家做客，在饭桌上对他父亲说：“你的儿子找了一个全国最大叛徒的女儿！……”这个同学回校不久，SM的家里发来了“母病危，速归”的电报，工宣队准了他的假。过了一周他回校了，我关切地问：“你母亲的病怎么样了？”我看到了他脸上从未有过的痛苦表情，他竟然点着了一支烟

抽起来,这也是他从未有过的举动。他艰难地对我叙述:“我母亲根本就没病,……父亲不同意咱们建立恋爱关系,他认为我们家祖祖辈辈是劳动人民,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政治污点,我是他唯一的儿子,他不愿意找一个叛徒的女儿作儿媳妇。我中学的朋友也反对我和你确定关系,怕影响我一辈子的政治前程。他们对我没信心,所以把我叫回家。”我听了非常震动,就问:“那你怎么办?”他说,给他父亲反复做工作,但是说不通,以至父亲说出:“你如果不和她断绝关系,我们就脱离父子关系”的绝情话。SM也向父亲最后表态说:“你不同意我和太行结婚,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是这辈子我结不结婚,和谁结婚,今后你们就管不着了!”他和父亲不欢而散,内心十分痛苦。我听后很伤心,既能理解他父亲的想法,又能理解他的感受。我明智而果断地说:“你是个孝子,父母生了10个孩子,只养大了你和妹妹两个,我们决不能伤老人的心,一定要尊重他们。我们就不要结婚,以后永远做朋友吧!”这是继父亲被定为叛徒后,命运对我的又一次打击与考验。我虽然很理智,能首先为别人着想,但感情上却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不知流过多少眼泪。所幸的是,SM一直对我很好,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反对而对我们的爱情发生动摇,我深知自己找对了人,能得到这份真挚的友谊和爱情,使我无比感动和珍惜。此事之前,我已经把和SM谈恋爱的事告诉母亲,她知道后高兴地说“与工农子弟结合,能弥补干部子弟的不足,大有好处!”她见过几次SM,印象很好,对我很放心。

1970年6月,人民大学的最后两届学生(即69和70届)毕业分配。清华和北大“两校”的这两届学生已经在3月先期分配工作,我大弟弟这个清华工物系的高才生,因受父亲问题的牵连,完全被排斥在核工程物理专业之外,分到了辽宁本溪重型机械厂当翻砂工。这时我们家已基本零散,大妹妹1968年(18岁)夏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3农场劳动,母亲于1969年1月去了江西进贤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这年3月,17岁的小弟弟和15岁的小妹妹一起去延安插队。在大弟弟离开北京之前,妈妈回来探亲,她对我们说:“咱们都走了,房子不要了,交给公家吧!”于是,1970年3月中旬以后,我们在北京就没有家了。剩下我一个人,平日住学校,周末就去老邻居谷奶奶(谷牧的母亲)家里。6月中旬,我们学校的分配方案下来了,我们系有10个辽宁的名额,我想,SM有可能分到辽宁,他是独子,父母年事已高,需要有人照顾。至于我自己,到哪里

都行，一是母亲长期教育我们，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她是为党而培养我们的；二是身为“可教子女”，根本没有自己选择工作的余地。事情也巧，有两个被工宣队动员去新疆工作的同学（是男女朋友）强调有各种困难不愿意去，工宣队就去找SM谈：“你是党员，能不能带头到边疆去？”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工宣队知道我们俩的恋爱关系，就把我也分到了新疆。到边疆工作的同学有30天的探亲假，我给妈妈写信说去新疆前想到干校看看她。她来信支持我到边疆工作，说“3月份不是刚见过面吗，不要那么多儿女情长了，快去新疆报到吧！”接到妈妈的信我大哭一场，她还不知道SM的父亲不接受我，我已经成为无家可归的人……。SM先回家再做父亲的工作，我住在谷奶奶家等候他的消息。在他的耐心说服和他妹妹的大力帮助下，终于做通了父亲的工作，我接到他的电报立即启程赴大连。这一次与他全家的团聚又伤心又高兴，伤心的是我们远走天边，今后不能时时孝敬辛劳了一辈子的年迈父母；高兴的是SM全家终于接纳了我，我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在边疆携手共进了。

我们这两届学生走了以后，听说是毛主席指示解散了人民大学，他认为文科大学的学生要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学习，关在学校里学不到什么真正的知识。人大的干部和老师大部分去了干校，少部分分到北京其他高等院校。

回想在人民大学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和我的思想变化、行为表现，还是应验了那个规律，即：我自发的认识往往是正确的，一旦改变自己的认识，紧跟上面的指示，反而是错误的。文革一开始，我自发抵制，那是发自内心的朴素认知，是正确的；中期，我不断反省自己，批判自己，改造自己，甚至很不情愿地与父亲划清界限，当我跟上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时，也正是我犯错误的时候。我不像一些干部子弟那样，看出文革的荒谬和错误时，按自己的意志办，退出激烈的文革，或当“逍遥派”，或冷静地思考和学习。我太投入了，太盲目地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走。因为党和毛主席在我心目中太崇高、太伟大了，高于我的父母，胜于我的生命。父亲的问题出来后，并没有影响我的革命积极性，总感到我是党的孩子，决不能因为自己和家庭受到冲击从此就消沉。出于对党的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我觉得逍遥是可耻的、是“逃兵”的行为。我母亲曾劝我：“你不要去学校了，学校里搞武斗，很危险。”她还多次批评我：“你这个孩子是我们家最偏激的，钻牛角尖，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不服气，

反驳母亲说：“你就没有门和的路线觉悟（门合是文革中宣扬的一个所谓有路线觉悟的干部）！毛主席说了，要在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我是学政治的，你应当支持我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学习和锻炼！”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的批评一语中的，当时头脑太热，根本听不进去。与母亲的冷静和坚毅相比，我感到很惭愧，在我身上，确实有狂热和软弱的一面。母亲始终坚信我父亲不是叛徒，在那样险恶的条件下，她完整地保护了父亲的日记、笔记等材料，1969年1月，她是带着父亲的材料和姥姥的骨灰去了江西进贤“中办五七干校”。我父亲的老秘书刘叔叔甘愿受牵连，挨批斗，一直坚持说我父亲是最好的人，他把我父亲的大照片放在毛主席像的背后保存下来，还保存了父亲的大量工作笔记和他写的回忆我父亲的文章《一颗红星》。而我，却烧了父亲的珍贵照片和自己的日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这是我遗憾终生的一件事，我对不起父亲，也对不起母亲。在此后一生中的任何时候，每当回忆往事，我都不能原谅自己，内心很疼很疼。❏

【资料】

奋起千钧棒，砸烂旧世界

中国人民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1966. 8. 18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中国人民大学“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诞生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这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日子，我们最伟大的导师、最伟大的领袖、最伟大的统帅、最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和我们站在一起，共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都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子弟，我们是革命后代，“父母革命儿接班”，我们要发扬老前辈的光荣传统，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在斗争中当先锋，打头阵，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勇于做出最大的牺牲，为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任务，贡献出一切。

我们“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红卫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忠实红卫兵，是劳动人民的忠实红卫兵。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就是我们的最高统帅。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最高指示。党中央的十六条是我们的行动纲领。我们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做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做冲锋陷阵的突击队。

我们“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彻底革命的红卫兵，是无产阶级的造反大队。我们的父母前辈就是革命的造反专家，他们造旧中国的反，造蒋介石的反，造帝国主义的反。今天我们也要造反，造帝国主义的反，造修正主义的，造资产阶级的反。我们要集中火力向我校两条黑线展开猛烈进攻，向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只要黑线、黑帮存在一天，我们就要造反一天，革命一天，一反到底，革命到底。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砍头不怕，流血不怕。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我们“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永远做人民群众忠实的勤务员，向我们光辉的榜样毛主席学习。永远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站在一起，恭恭敬敬地做人民群众的儿子，做群众的小学生。

我们“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每个战士都要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洗涤自己，改造自己，不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我们敢于造旧世界的反，敢于造牛鬼蛇神的反，也敢于造自己身上缺点、错误的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来临了！它将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权威老爷们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卷入东海，让那些旧世界的渣滓见鬼去吧！

我们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卫士，在革命的暴风雨中诞生，也将在革命的暴风雨中成长、壮大。我们要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革命中学会革命。让革命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干革命，哪怕上刀山！干革命，何惧风浪险！

为人民我们敢于洒尽一腔热血，在这场大革命中，我们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捣毁旧批界，向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开展总攻击，把一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打个落花流水，砸个稀里哗啦，

杀出一个新世界！

誓做一辈子永不褪色的，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

【资料】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人民大学新校刊试刊第二期

1966. 9. 10

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今天正式成立了！目前，我校阶级斗争正面临着一个错综复杂的新局面，为了更好地投入这场斗争，为了更好地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决定成立一个战斗组织——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

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是要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生，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死，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特别是要用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来武装我们头脑，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我们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最高指示，首先是学习、执行、宣传、捍卫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种思想、观点、言论和行动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因此，我们必须以百倍、千倍、万倍的警惕来对待这场异常尖锐、异常复杂的阶级斗争，只要我们掌握阶级斗争这个武器，就一定能在任何迷离混淆中，分清敌友，明辨是非。

红卫兵的任务就是造反。阶级斗争的存在决定了我们必须造反、造一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之反，造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黑线之反。造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之反；只要资产阶级及其影响一天不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造反，坚决造反，造反到底。但是，我们只许无产阶级造反，决不许资产阶级翻天。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总要想复辟，想“造反”，并企图把这种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对于这种造反，我们立即取缔，坚决镇压！这就是我们造反精神的阶级性。无产阶级的

造反，绝不是违法乱纪，绝不是争权夺利，而是在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政策指导下的、革命的、高水平的造反！这就是无产阶级造反精神的科学性。要想造反，就必须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红卫兵一定要继承革命先辈的造反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不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把旧世界粉碎，不把一个通红的新世界建立起来，死不瞑目！

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要做彻底的革命派。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我们不但要积极完成我校的文化革命任务，而且要以天下为己任，像白求恩同志那样，做国际革命促进派；所以必须冲破一切束缚我们的旧条条框框，打破班级、校系界限，进行革命的串联，革命的交流，革命的支援。红卫兵必须按照毛泽东思想，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我们干文化大革命、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必须要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红卫兵必须在群众斗争中，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做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红卫兵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共同战斗。

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忠实的红卫兵；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红卫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忠实的红卫兵。毛主席的指示是红卫兵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红卫兵句句听，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坚决支持，坚决执行，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就坚决抵制，坚决斗争，坚决造他的反！

【资料】

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

——评校筹委会

人民大学新校刊试刊第七期

1966. 10. 10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我校开展，进行已有四个多月了。但在这一长时间内，我校运动进展却十分缓慢；至今还没有真正斗倒一个黑帮分子。

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领导，在于校筹委会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真正贯彻、执行十六条，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一句话，没有彻底革命的决心。两个月的实践证明，筹委会无论在对敌斗争、在处理革命群众内部问题，都贯彻的是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筹委会辜负了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希望，成为我校进一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把我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认为必须坚决批判筹委会的右倾思想和右倾路线。

下面我们就筹委会的几个主要错误，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违背十六条，把运动引向右的方向

1. 阻止群众揭发批判郭影秋的修正主义错误。

筹委会成立伊始，就遇到了关于郭影秋问题的辩论，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筹委会就开始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在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发动起来，集中火力，炮轰校党委时，揭发，批判校党委第一书记郭影秋所犯下的修正主义错误，是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革命群众革命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对待这个问题上筹委会不是大力支持革命师生员工的革命行动，而是是非不分，任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挑动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在八月十四日晚陶铸同志、邓小平同志，找校筹委会全体成员谈话，明确指出：郭影秋肯定不是革命左派，无非是二、三、四类干部，就现在揭发的材料来看郭也不是黑帮，对郭的问题要充分发动群众，集中精力，集中时间，进行大揭发，大辩论。可是筹委会领导没有按照中央首长指示去做，他们传达首长指示时，私自作了删改，给郭影秋下了“二、三类”干部结论。他们虽然也表示可以继续贴郭的大字报，但他们这种做法，实际上起了阻止揭发、批判的作用，使运动为之“卡住”，影响运动及时、迅速地深入发展。

郭影秋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正确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在运动中表现不好，犯了严重错误。因此，中央罢了他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的官，要他回我校进行检查，并交给我校革命师生员工揭发、批判。可是，郭影秋自七月二十九日回校后直到现在，筹委会从来没有让他在全校大会做过一次公开的检查。筹委会的领导把中央的指示置于何地？

筹委会某些领导处理郭影秋问题时，既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起

来大揭露，大批判，也不相信党，不能正确的、忠实地执行党的指示，这样的筹委会能算是革命的筹委会吗？这样的筹委会还要它干什么！

2. 对敌斗争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

孙泱是前中宣部陆定一黑帮的忠实走卒，是人民大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运动一开始就被揪出来了，但是，筹委会领导斗争孙泱很不得力。筹委会也组织过几次斗争会，但是由于筹委会没有把孙泱斗倒、斗臭、斗垮的决心，每次大会战前不准备、战后不总结，火力不集中，打打放放，松松垮垮，所以直到现在，孙泱仍然没有斗倒、斗垮。

在三大部的干部，知情人多，了解情况多。但是他们在炮轰校党委的斗争中，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其原因是，筹委会没有认真发动三大部中干部，没有彻底揭开三大部办公楼内阶级斗争的盖子，这是孙泱问题没有搞深搞透的原因之一。

3. 分散力量转移打击目标

胡锡奎是我校“老大难”问题的罪魁祸首，是我校的老黑根子。我校绝大部分革命师生员工对胡是同仇敌忾的，在斗争胡锡奎的问题上，本来全体革命师生员工是一致的。但令人气愤的是，筹委会某些负责人不但没有注意做好团结工作，反而在进行分裂活动。如李豫生同志在“九·一二”大会上就公开说什么：“对胡锡奎现在我们也不可能统一起来。”还说“现在筹委会也有两种意见，也是黑线的反映”。李这样讲，到底是为了什么？

胡锡奎是我校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老黑根子，筹委会本应发动群众，集中火力，狠斗胡锡奎，坚决把胡锡奎斗倒、斗臭。可是筹委主任在其安排工作时，却大讲什么“要把胡锡奎的党羽、虾兵蟹将斗倒、斗垮、斗臭。”他还绘声绘色地严厉警告“胡锡奎的党羽，你们想蒙混过关是办不到的。”（后来在登校报时由于上述意思的话见不得人，都被删去了。）

林彪同志讲话和十六条中，都指出，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筹委会某些负责人，却无视党中央的这一指示，企图分散力量，转移打击目标。他们在客观上就是起了保胡的作用。

二、制造分裂，破坏团结

我校筹委会的某些负责人，对敌斗争束手无策，软弱无能，但在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方面却很内行，很热衷，最为显著者就是对待红卫兵的态度。

1. 攻击、诬蔑，妄图解散人大红卫兵

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在八月八日成立。红卫兵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争中诞生的，是革命的群众组织。我们伟大的领袖对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最大的关怀和支持，毛主席是我们红卫兵的最高司令。这是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的最大幸福。

但对这一新生事物，在人民大学有一部分人却冷嘲热讽，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和咒骂。一时间，流言蜚语塞满校园。校筹委会的一些负责人也乘机而动，充当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在八月十二日晚，筹委会副主任李豫生代表校筹委会登台讲话，趁火打劫地专门挑了一个“我们坚决要求解散人民大学红卫兵”的条子，高声朗读，引得一群人的热烈喝彩！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市委指示要人大红卫兵，派十名代表去执行重要的政治任务（上天安门）筹委会某些人却说：“人大红卫兵名声甚坏！”对市委指示阳奉阴违，要另派十名不是红卫兵的人去代替执行，企图剥夺红卫兵搞革命的政治权利。上天安门见毛主席这是一项极为重大严肃的政治任务，筹委会某些负责人对此如此轻率，完全丧失了一个革命者起码的政治责任感。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对待革命的新生事物采取什么态度，也是检验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重要标志，把李豫生和筹委会的某些负责人的言行和主席的教导对照一下，他们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2. 制造分裂，破坏团结

八月二十号，人大“八·一八”红卫兵成立了，我们认为，人大的两个红卫兵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尽管他们在郭影秋的问题上有分歧，但他们的革命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在革命的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两个红卫兵完全应该团结起来，也一定能够在斗争中，逐步地团结起来，校筹委会对两个红卫兵本应采取正确的态度，促使两个红卫兵在对敌斗争中团结起来共同完成我校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斗争任务！但校筹委会对两个红卫兵不是一视同仁而是扬此抑彼，从中制造分裂，破坏团结。从“八·一八”红卫兵成立以后的一系列活动中筹

委会无不大力支持，大开方便之门，无论在物资供应、派车、印刷等方面有求必应，而对人大红卫兵却处处刁难。甚至在九月十九日人大红卫兵响应党的号召，组织三十人下多支拨“三秋”，筹委会还不给派车。在此我们要问，难道筹委会不是全校文化革命的领导机构吗？难道筹委会不是为全校革命师生员工服务的机构吗？为什么筹委会对待两个红卫兵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这不是在搞分裂又是在搞什么？

三、筹委会错在哪里？

筹委会千错万错，最根本的错误就是在领导运动中，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大抓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十六条”明确指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在广大工农兵、广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但是：在筹委会一些负责人的指导思想上根本不把毛主席著作学习放在首位，而是放在第二位、第三位。

1. 筹委会整天埋在具体的事务工作圈子里，忙得不可开交，晕头转向。从来没拿出一套像样的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计划、决定，从来没组织过一次校内讲用会，从来没有组织过校内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也从来没有到先进单位去取过经，从来没组织我们到先进单位去参观访问。

2. 筹委会的主要干部没有带头学好、用好毛主席著作。不是走在群众前头，而是落在群众后而。例如团结问题在我校一直存在，而首先是因为筹委会本身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不但没有带头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为同学们做出团结的样板，反而在一些言行上；还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破坏同学的团结。

3. 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一直没有保证。上午 8-10 点雷打不动的时间，实际上是一打就动，往往就是筹委会自己带头冲垮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

4. 筹委会是上不抓学习毛主席著作，下不了解同学们的思想，从来没有认真地做过思想工作。解放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突出政治，狠抓“四个第一”的政治工作经验，从来不注意，不重视，不实行。

5. 筹委会对广大革命师生员工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好经验、好典型，从来不闻不问。时至今日，从未见筹委会总结过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

从未见过树立起什么典型。难道我校真是一穷二白吗？不，绝对不是。

从以上事实看，实际上，目前的筹委会所执行的路线不是毛泽东思想的路线，而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或曰修正主义的路线，这是我校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必须踢开！

全校革命红卫兵战士们，全校革命的师生员工同志们，让我们以十六条为武器，彻底批判我校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它对我校运动产生的恶劣影响，为坚决彻底贯彻执行十六条、为坚决彻底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战斗！奋勇前进吧！

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新闻系中队

新闻系“七一”战斗组

【资料】

我起来造反了

——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士戴万春同志

在十月二十一日革命造反大会上的发言摘要

人民大学新校刊试刊第十期

1966. 10. 31

我是东生中心联络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谈一谈我所知道的东生中心联络组。

东生中心联络组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校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现分几个问题来谈。

（一）成立的目的：

第一次辩论会（8月2日）结束后，我很赞成吴xx的发言，就去找国政系同学和东风三个楼的同学串联，成立了一个联络组，当时还没有起名，就是后来的东生。从成立之后，东生联络组的一些负责人就强调指出，我们的口号要响亮，旗帜要鲜明。什么口号？就是“郭影秋是我校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代表”。

什么旗帜？就是“我们要坚决保卫革命左派郭影秋”。看看，很明确嘛！目的就是“保郭”。

（二）指导思想：

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郭影秋“七三”汇报要点的翻版。左派刚起来讲几句话，郭影秋就认为是“右派翻天”，要把矛头指向群众，说什么“在野的右派”，“新生的反革命组成了夺权的联盟”把群众打成了“反革命”。郭影秋同样错误地看待了我校的形势。他认为揭发批判他的同志后边有条黑线控制着，左派还没有站出来说话。这就是挑动群众斗争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吴xx八月二十日的发言，昨天我又听了，老实讲，那里而没几句是她自己的，都是郭影秋。那篇讲话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

东生联络组在估计形势时，一再强调：我校阶级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赵霞秋、向青、麦农、徐一志、李成助、樊亢、何思敬等组成了一条黑线，要夺左派的权，群众是受了这条黑线的影响和操纵。郭影秋是左派的代表，我们要保护革命左派，保护郭影秋！打黑线，立红线。什么红线？说穿了，还不是保郭影秋。这样就欺骗了广大群众，把揭发、批判郭影秋的同志当成了黑线。这样的指导思想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是什么？

（三）和郭影秋的关系：

关系非常密切。郭影秋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东生联络组许多成员常往郭影秋那儿跑，向他了解情况，核对材料，接受他的观点。别把当权派幕后操纵者看得那么神秘，他的观点，有人接受，有人传播，能左右群众的行动，就是幕后操纵。

东生联络组的成员，有专人替郭影秋打饭，怕别人放毒。

东生联络组的成员，有专人来往于郭影秋和凌静之间，替郭影秋取钱，取衣服等。

东生联络组的成员，有专人在郭影秋屋里作来访记录。

东生联络组的成员，有专人替郭影秋守门，还在东风二楼二层会议室轮流值班。

东生联络组的成员，还给郭影秋安排了秘密休息室。

这叫什么关系？是选择目标的不同意见争论吗？不！这是“保郭”。郭影秋

是当时的揭发批判对象，你不揭他的问题，还和他站在一起，千方百计“保”他，这能说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

（四）“八·一二”事件：

有人说，八·一二保卫东风楼事件是筹委会策划的，不对。这是东生联络组干的，筹委会一些人知道后不制止，还支持，那是后来的事。

八·一二深夜，农经系一位同学敲门找我，说有人得到消息，明天有各学校五千个红卫兵来斗郭影秋。我听后半信半疑，赶忙让她继续通知其他人。我也在本系找了两个人，一起赶到历史系食堂后边的一块空地上，开了个秘密会议。有人说：“此消息是张 xx 传来的”。我当时到红楼找到张 xx，问他，他说：是在文化广场听到有小孩这样议论，让我们小心。此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讲这些话？今天必须追查。

我赶回开会的地方，说了了解到的情况，并指出，消息不确切，要斗就让他们斗，斗也是革命行动。他们一斗，我们就主动了，可以据理力争。当时，东生联络组的一些主要负责人急忙说：“问题就是不能让他斗、一斗就糟了，不管事情会不会发生，我们还是一定要保护好”。

于是，连夜安排人乘车到市委和吴老那里去告急。派人叫出租汽车护送凌静逃走避难，怕她挨斗。派人组织工人同志，以及到各系调动人马，还制定了严密的防御措施，如：窗户怎么关，空出多少房间藏工人，每个楼梯站多少人，怎么把守，怎样防止爬梯子，怎样安装扩音设备等等，忙了一整夜。第二天，工人和同学一听消息很紧张，很气愤，都拥到了东风二楼，打乱了原来的安排。

这是一次严重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事件。

（五）和工人的关系：

东生联络组组长是老红军李文华同志。说句老实话，李文华同志并没有起决策作用。让他当组长，实质上是借他的威望。因为李文华同志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这叫欺骗工人。有的工人同志也确实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了，如围攻揭发批判郭影秋的革命群众，骂红卫兵等等。这不能怪工人同志，我们批判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八·一二事件，就是工人受欺骗、受利用，不自觉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了。

（六）和贫下中农的关系：

东生联络组里有的成员，到农民那里宣传黑帮要斗郭影秋。农民火了，说谁斗郭影秋谁就是黑帮。第二次大辩论时，还要带着镰刀来擒黑帮，后来没带。这不是明显地挑动农民斗学生吗？

八·一八串联会，是东生联络组把贫下中农和南大同学接来的。这是一个纯粹的评功摆好会。贫下中农来干什么？东生联络组的一些主要负责人也说，要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对方。对方是谁？是揭发、批判郭影秋的革命群众。对揭发批判郭影秋的革命群众进行压制，还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七）和吴老的关系：

据我所知，东生联络组的一些主要负责人，不止一次地到吴老那里去，通过吴老往上送材料。吴老的住处是秘密的，电话号码也是秘密的，为什么东生联络组知道？东生联络组开会时，有人说，“吴老赞成我们”。我认为，吴老有错误，年纪大了，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学习不够，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同样很不理解，他不支持革命造反派，不支持揭发批判郭影秋，这就是个大错误。

（八）和八一八的关系：

有人说，八一八与东生联络组没有丝毫联系，八一八对东生联络组的一切概不负责。我说，不是，他们有联系。

八一八的发起人的确不是东生联络组的，但八一八一开始筹备成立，绝大部分东生联络组的成员都参加进来了，有的人担任了初期的领导工作，有的人到现在还是八一八的领导嘛！

还要提及一点的是朱 xx 同志。朱 xx 是东生联络组最主要的负责人。八月二十日辩论会以后，他还在领导联络组工作。在我八月二十七日外出串联以前，还开过几次会，有一次我参加了。

可见，不像有人说的，从八月二十日大辩论之后，东生联络组就解散了。不是这样的，其实，到现在也不能说它解散了。不信你们看看，赤卫队的《无产者》编辑部里，住的都是东生联络组的人。朱 xx 这个人有点神秘，他不是工人，为什么办《无产者》？为什么他能代表赤卫队参加八一八的联席会议？赤卫队和八一八的关系是人所共知，一目了然的。这能说东生联络组与八一八没关系吗？直到十月六日唐 xx 的那个发言，还是朱 xx 起草的哪！

这些是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东生联络组的思想、幽灵是在八一八里，是思想基础。八一八成立后，对东生联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了吗？直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今天，也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嘛！

关于东生联络组的问题，我就谈到这里。过去我参加了东生中心联络组，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很深，现在觉悟了，我要造反！

我还要说一点，今天开这个会，有人认为团部的检查很好，我们认为是通不过的，因为他们不检查自己的错误，而是和过去辩论郭影秋一样，首先评功摆好，然后扣几个大帽子，再来几个“但是”……，这叫检查吗？接着就是团部上来澄清事实，讲了半天，目的就是不让战士们起来揭发、批判团部的错误。第三个就是团长来搞作战部署，说什么搞李雪峰、郭影秋、工作组。但就是不敢触及自己的灵魂，逃避自己的问题。团部的态度不能说是诚恳的，不能说是胸襟坦白的。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团部所犯的 error，就够造反的条件了！

我昨天发表声明，才造了一天反，就挨了不少骂！少数派的确不好当啊！出去串联支持少数造反派，感到过去不对头，错了。这次学习了《红旗》十三期社论，反复认识到上面所谈的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造反，可是一造反，就有人冷眼相看，有人讽刺造谣地说：“你当了造反连的指导员啦！”难道我们造团部的反，就成了敌人了吗？有的人口里高喊，造反有理。可是手里就是不高举革命造反的大旗，心里老是觉得，“革命有罪”，“造反无理。”这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八一八团部错误路线的反无罪，造八一八团部错误之反有理！

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1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